

## 中古貨幣的流動性特徵： 從貨幣數量變動論魏晉南北朝 自然經濟的制度根源

陳彥良\*

「流動性」是指交易媒介轉換成其他物品的速度，或方便的程度。較之實物，金屬鑄幣(含金銀銅等)具有更高的流動性。故物物交換模式之困難，乃因其流動性太低。經濟體中貨幣數量是流動性的基礎。但流動性過剩造成通貨膨脹，過少則造成通貨緊縮。因之貨幣數量的劇烈變動(反映在緊縮與膨脹上)，意味著將對經濟造成流動性的衝擊。

對於中古六朝歷史，全漢昇最先提出「自然經濟」之說，其後學者補充指出魏晉南北朝是「貨幣大混亂」時期，勞幹則進一步言，中古貨幣的問題在於幣制之混亂，不能為市場交易提供「精確的標尺」。本文則進一步從「流動性」概念出發，提出「兩個悖論」之說，認為中古經濟受到因通貨供給不足，以及多次發行虛價錢幣、頻繁改制、錢幣剪鑿和優質銅錢遭到窖藏這些因素的影響，面臨到通貨的膨脹與緊縮同時存在、彼此交織的「雙重的

---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聯絡地址：97401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2段1號(No.1, Sec. 2, Daxue Rd., Shoufeng Township, Hualien County 97401, Taiwan (R.O.C.))。

流動性困境」；這種困境表現出「長期通貨緊縮格局下更迭發生膨脹性擾動」的特徵。這一個現象不僅有文獻上的證據，也受到眾多考古材料的支持。三國兩晉南北朝雙重的流動性困境源頭主要在於各朝政府不當的貨幣政策。此一困境成為決定中古社會經濟結構的重要力量之一。

關鍵詞：魏晉南北朝、貨幣史、流動性、通貨緊縮與膨脹、自然經濟、五銖

學者概括中古以前的社會經濟發展，認為西周到戰國初期 600 餘年屬於一個階段，戰國後期到東漢末年近 700 年屬於一個階段，三國到隋初即魏晉南北朝近 400 年時間又屬一個階段。<sup>1</sup>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經濟特徵，歸納起來不外乎大土地所有制、莊園下的依附性生產，以及自然經濟(或物物交換)模式——在貨幣的發行和流通上，中古六朝鑄幣雖未完全消失，但受到約束而呈現萎縮與畸變狀態則是明顯的事實——。這樣的見解可以提供經濟史分期的基礎。在這樣的觀察之外，其他學者如李劍農等人進一步指稱，魏晉南北朝是一「貨幣的大混亂」時代，<sup>2</sup>或是如王健所指，六朝時期體現了通貨膨脹(錢幣貶值)與通貨緊縮(錢幣漲價)的交替出現。<sup>3</sup>這些同樣是極為貼切的看法。

儘管如此，中古時期貨幣的混亂因何而生？有沒有其他特徵？這時期中南北各代政權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針對這些課題，過去雖有全漢昇、何茲全、李劍農、傅築夫……等等前輩學人，晚近也有王怡辰、柿沼陽平等學者提供若干認識基礎，<sup>4</sup>但是到目前為止做出突破性研究的論著似乎還不太多。尤其近數十年來考古出土史料累積浩繁，足堪作為全面重新整理和詮釋中古貨幣演變的依據，不過史學界中能給予充分重視和利用的仍算是極少數。這使得中古貨幣史的研究自全氏之後近

<sup>1</sup> 這三個發展階段，無論從社會經濟的總合來看，或從生產方式、商業活動、階級構成、土地制度、賦稅制度、貨幣制度分開地看，每一段各有其異於其他段落的确切特徵。參閱馬乘風，〈從西周到隋初之一千七百餘年的經濟轉移〉，收入于宗先等編，《中國經濟發展史論文選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下冊，頁29-45。

<sup>2</sup> 李劍農，《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頁69-84；陶希聖、武仙卿，《南北朝經濟史》(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頁129-130；錢公博，《中國經濟發展史》(臺北：文景出版社，1982)，頁195。

<sup>3</sup> 王健，〈試論六朝幣政與商品貨幣經濟的互動關係〉，收入中國錢幣學會古代錢幣委員會、江蘇省錢幣學會編著，《六朝貨幣與鑄錢工藝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頁140。

<sup>4</sup> 參閱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上冊，頁1-141；何茲全，〈東晉南朝的錢幣使用與錢幣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上海，1949)，頁21-56；傅築夫，〈貨幣經濟的衰落與實物貨幣的代興〉，《中國經濟史論叢》(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頁700-767；王怡辰，《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柿沼陽平，〈晉代貨幣經濟の構造とその特質〉，《東方學》，120輯(東京，2010)，頁18-33。

乎裹足不前，無疑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本文的目的在於從貨幣的流動性(liquidity)的角度，結合考古發掘出土與傳統文獻兩方面的材料，概觀中古六朝貨幣的動態特徵，並分析該時期貨幣結構與各朝政策面因素的關係，以為上述問題的回答。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以重點摘述史實、剖析其中關鍵內容為論述原則，嘗試就魏晉南北朝貨幣的長期演變給予一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的掌握，冀可以作為往後更深入研究之基礎。

## 一、錢幣的功用和意義：杜佑的貨幣史觀點

「六朝，錢制之轉關也」，此語出自清代泉學家翁樹培(1764-?)。翁氏認為六朝為古代通貨形制的一大轉折，該時期錢幣的變化，表現在錢文由記重向朝代年號的轉變，其次是書體由篆書向楷、隸、行草轉變。翁氏的說法是從「錢幣學」的角度得到的結論。<sup>5</sup>但若從「經濟史」的進路而言，全漢昇著名的「中古自然經濟」之說自然是一個更深刻的命題。自從1940年代全先生提出魏晉南北朝交易媒介以實物貨幣為主的觀點之後，雖然曾經遭遇挑戰與修正，但可以說中古經濟和貨幣的認識基本上已由全氏之說而獲得奠定。<sup>6</sup>全氏的研究包含一個重要論斷，此論斷可以概述如下：

漢末以後，中唐以前，一共五百多年的中古時期，實在是一個自然經濟佔優勢的時代；牠有別於此時期之以前(漢代)貨幣經濟的相當發展，更有別於此時期以後貨幣經濟的興起。……這五百多年的中國社會的確是和以前及以後都大不相同的。<sup>7</sup>

這就是全先生著名的「中古自然經濟」之說。他認為，中古社會經濟自成

<sup>5</sup> 翁樹培，《古泉彙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頁338。錢幣學(numismatics)通常不涉及經濟內涵的探討，有之亦不深。貨幣史則與經濟史息息相關，因此可以比較適切地反映時代的特性和問題。

<sup>6</sup> 如何茲全指稱的，東晉南朝所在的南方揚、荊、益、交、廣等地的貨幣使用頻繁，非如十六國北朝時期北方地區的消沉。近來王怡辰也有類似的觀點。參閱何茲全，〈東晉南朝的錢幣使用與錢幣問題〉，頁21-56；王怡辰，〈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頁3-4。

<sup>7</sup> 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頁140。

一個段落，原因在於「錢幣的使用……從漢末以後卻宣告停滯。……錢幣的廢棄，給實物貨幣以流通的機會。這樣一來，自然經濟遂代貨幣經濟而起」。<sup>8</sup>

類似的看法，亦見於早期日本內藤湖南(1866-1934)的觀點，只不過內藤認為，延續至唐代仍然是實物經濟的時代，貨幣的流通要到兩宋以後才成為主流。而其他重要學者如陳寅恪、傅築夫、唐長孺的見解與全氏大抵相同。如陳氏之論：「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面，關於社會經濟者如此，關於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基本上可與全氏的論點相發明。<sup>9</sup>

反觀傳統學者之中，對於中古六朝貨幣史有透徹理解的亦不乏其人，其中尤以唐代杜佑(735-812)為代表。杜佑的見解今天仍有參考價值，主要是因杜氏去中古未遠，本人又曾給予系統整理，有深刻體會之故。《通典》，卷8，〈食貨八〉以數言概括中古錢幣演變：

魏文帝穀帛相貿。劉備以一當百。孫權以一當千。理道陵夷，則有鵝眼、線環之別；王綱解紐，又有風飄、水浮之異。名目繁雜，不能遍舉。<sup>10</sup>

這些話雖然很簡略，但已掌握到中古幣制變化的精髓。借用今天的術語，那麼「魏文帝穀帛相貿」一語，無非意指曹魏政權為魏晉南北朝歷史起了一個通貨不足的開頭，故交易不得不藉用穀帛等實物。在此之後，因為通

<sup>8</sup> 全氏特別申述補充上述看法：「中國在漢末的五百餘年內，『並不是完全沒有』錢幣的流通，不過錢幣流通的數量非常之少(有時甚至等於零)，故實物貨幣乘機取錢幣的地位而代之而已」(雙引號為本文作者所加)。當然，〈中古自然經濟〉一文主要在呈現中古社會如何「自成一個段落，有別於這時期以前及以後的社會」這個重要的歷史判斷，但無庸諱言的是，全文對於這一時期之內貨幣及流動性因素如何與社會互動，以及如何對於經濟的運作產生作用等方面較少著墨。就這一點觀之，全氏的經典論文可以說是一個未竟之業。見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頁141。

<sup>9</sup> 參閱高明士，〈唐宋間歷史變革之時代性質的論戰〉，《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臺北：東昇出版社，1982)，頁106-107；陳寅恪，〈論韓愈〉，《金明館叢稿初編》(臺北：里仁書局，1981)，頁296；傅築夫，〈貨幣經濟的衰落與實物貨幣的代興〉，《中國經濟史論叢》，頁700-767；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頁39-42。

<sup>10</sup>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8，〈食貨八〉，頁167。

貨的持續缺乏，交易困難，而南、北各個割據政權又為了從鑄幣中抽取高額利潤，於是而有劉、孫二氏當百、當千之類的鑄行。延伸至於兩晉及南北朝，通貨稀少與政府財政惡化的狀況依然，且越到後來越是厲害。如此每況愈下的結果，遂有「鵝眼」、「縲環」的紛錯行使，以及「風飄」、「水浮」的陸續出臺。

我們注意到引文中，杜佑特別用「理道陵夷」一詞，對舉於「王綱解紐」，這樣做的用意是採取比較委婉的方式，諷喻中古各朝政府在貨幣政策上的消極懈怠，以及不得其法。最值得稱道的，是杜氏對於中古貨幣史的描寫，可以說是在對貨幣運作原理有透密認識的情況之下才道得出的。觀他這一段話可知：

原夫立錢之意，誠深誠遠。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其金銀則滯於為器為飾，穀帛又苦於荷擔斷裂，唯錢但可貿易流注，不住如泉。若穀帛為市，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難乎銖兩分寸之用。<sup>11</sup>

事實上，這番話差不多已經點出中古貨幣問題的全部癥結所在，與全氏之說可以相發明。杜佑所說「凡萬物不可以無其數，既有數，乃須設一物而主之」一語，道出貨幣的最重要功能，乃是計算、度量物品的價值(包含現下與未來)。正是這一句話，證明杜氏具備一般學者欠缺的對於貨幣運作的深刻洞見。<sup>12</sup>如果世間貨幣無法提供價值計算或度量的便利，那麼它便要喪失存在的意義。而進一步說，貨幣之所以無法提供作為價值計算或度量的工具，往往若不是因為數量過多，就是因為數量太少，或者是種類太多、不便於切割、兌換找零太複雜太困難，以及輕重或成色變化太急遽而引起。此外杜氏所言「唯錢但可貿易流注，不住如泉」，則幾乎已經暗示貨幣所具有的「流動性」特質，此一特質是其他如粟米布帛等現物遠遠趕不上的。

<sup>11</sup> 杜佑，《通典》，卷8，〈食貨八〉，頁167。

<sup>12</sup>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論〈經濟史的概念〉曾說道：貨幣「使計算成為可能，讓我們有一共通的標準來衡量所有的財貨，這是其最大意義之所在；因為透過貨幣，方便經濟行為之計算的合理性具備前提條件，『計算』方有可能」。韋伯這裡的說法極為正確，而與上述杜佑的主要見解，實無二致。參閱韋伯著，康樂編譯，《經濟與歷史：韋伯選集(IV)》(臺北：遠流出版社，1990)，頁16。

這一點，尤其能夠突顯貨幣在交換經濟中地位之重要。

人類社會中凡有價值之商品，皆可以作為交換(轉換其他商品)之媒介；「流動性」(liquidity)正是指那種市場中轉換成其他物品的速度或方便的程度而言。「流動性」高，轉換快，交易成本低；「流動性」低則反是。雖同樣具貨幣的功能，然而相對於穀帛鹽鐵等實物，古代的金、銀等貴金屬及銅質鑄幣(當代的紙鈔亦然)具有更高的流動性。從這個角度看，從一個社會主要交易媒介之流動性的高低，可以判別該一經濟體貨幣化以及商品經濟發展的程度。質言之，「貨幣經濟」(所內含的)流動性最高，而以實物為交易媒介的「自然經濟」流動性較低，另外，「自給自足經濟」(交易萎縮、貨幣缺乏)幾乎完全不具流動性。再者，當代貨幣理論中，一個經濟體流動性的高低是由貨幣數量所決定；流動性過剩造成物價膨脹(通貨膨脹)，過少則造成物價緊縮(通貨緊縮)。由此說來，貨幣數量的劇烈變動(反映在緊縮與膨脹上)，意味著將對經濟造成流動性的衝擊。<sup>13</sup>

杜佑所指，貨幣是計算、度量價值之最有效依據(計數「萬物」之「主」)，此一見解與勞榦(1907-2003)的見解遙相呼應。可能正是受到杜佑的啟導，勞氏在概括漢末至南北朝、隋至唐初 400 多年貨幣演變之時，非常中肯地說道：

自董卓作亂至唐初為錢帛並用之時，然價值按帛而計，此乃實物價值並非貨幣價值，足以說明此一時期之逆轉與退步，原來貨幣的需要為精確的標尺，若使用物物交換的方式就不能精確，這種原始形式，對於商業是不利的。<sup>14</sup>

勞先生所言「貨幣是精確的標尺」的說法，與杜佑「須設一物而主之」的意思基本一樣。<sup>15</sup>他們都強調貨幣的計價功能。而「若使用物物交換的方式

<sup>13</sup> 從而可知，透過因貨幣數量的收放造成的通縮和通膨的作用，可以觀察歷史中流動性變動的因由、內容以及後果。關於流動性概念的說明，可參閱林鐘雄，《貨幣銀行學》(臺北：三民書局，1990)，頁15、70、166-167。以及Thomas Mayer, James S. Duesenberry and Robert Z. Aliber, *Money, Banking, and the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1984), 1-14.

<sup>14</sup> 勞榦，《魏晉南北朝史》(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80)，頁104。

<sup>15</sup> 此觀點與17世紀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貨幣是商業的尺度，是一切東西的價格的尺度，所以應該(像其他一切尺度一樣)盡可能穩定不變」的見解一致。參閱洛

就不能精確」一語，則道出了作為計價依據的貨幣的不可取代，以及何以「自然經濟」對於市場的運作會產生危害這樣一個道理。公正地說，這些意見內涵的深刻認識，以及其所彰顯的學術價值，都是史學研究中不可忽視的寶貴資源。

不過，除了傳統如杜佑及現代如勞榦等學者所言，幣制混亂不健全不能提供「精確的標尺」，「非獨提挈斷裂之弊，且難乎銖兩分寸之用」，對於商業交易極其不利之外，中古貨幣發展還有更多的歷史內容與史學涵義值得進一步詮釋。

如前述，後來有一些學者逐漸認識到，在以自然經濟、幣制混亂且不健全為主要的交易特徵上，六朝時期經濟體現了通貨膨脹(錢幣貶值)與通貨緊縮(錢幣漲價)的交替出現。這種說法，代表著數十年來學界對於中古自然經濟這一課題更為深入的理解，從某些角度看，於全氏等人的說法已有所超越。然而這樣一個新見解固然正確，但還是不能夠說已完整地描繪出中古貨幣制度運作與演變的特色。更深入地看，魏晉南北朝的社會經濟不但受到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交替出現」(alternately)的影響，實際上，它還顯現膨脹與緊縮「同時發生」(simultaneously)之惡劣條件的激盪。這要從實際歷史演變的觀察與事件始末的剖析著手，方能清楚瞭解。

## 二、中古貨幣演變概觀：考古報告和文獻資料的佐證

### (一)考古資料的說明

出土實物可以印證魏晉南北朝通膨與通縮交替影響、同時激盪現象的存在。這方面資料及例證很多，已累積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考古報告或記錄不勝枚舉，難以盡述。以下，作者先就跨期較長的湖北鄂州地區六朝墓群出土錢幣的內涵加以分析，具體而微地說明從三國兩晉到南北朝時期貨幣

---

克著，徐式谷譯，《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後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頁100。



流通的一般情況。

在長江中游，鄂州地區的三國孫吳時期大、中型墓葬，多見瘞埋大量錢幣的現象，同時錢幣的內容與種類反映了兩漢錢幣鑄造數量的龐大，另外也可以看出三國時期吳、魏、蜀之間的經濟往來。<sup>16</sup>在鄂州中型吳墓中，常可見百枚以上的錢幣，多的有幾百枚，少數大型墓葬可達 1,000 枚。屬於長江流域一帶大型墓葬的鄂鋼飲料廠一號墓出土錢幣淨重 19.7 公斤，總數達 7,000 餘枚。這一批出土錢幣種類繁多，除了常見的前代五銖錢、新莽錢、剪輪錢、縋環錢、以及孫吳的大泉五百和大泉當千以外，還發現直百五銖和太平百錢等。<sup>17</sup>不過，孫吳時期一般墓葬錢幣出土數量卻很少，與宗室權貴墓葬形成強烈對比。<sup>18</sup>

到了西晉時期情況已有變化。鄂州地區西晉墓葬瘞錢數目有所減少，中型墓葬一般隨葬錢幣數 10 枚，大型墓葬 100 餘枚。及至東晉，錢幣數量更是明顯縮小，情況嚴重。一般約 10 座東晉墓中才有 1 座可見隨葬錢幣，而且數量都在 10 枚以下，種類以五銖錢為主。降及南朝，出土錢幣的墓葬依然少見，且錢幣數量之稀少更為顯著，<sup>19</sup>若有發現，則多以面值較大的前代三國吳錢大泉五十、大泉五百和大泉當千等。

<sup>16</sup> 其他如南昌市東吳高榮墓的發掘出錢幣 485 枚，不過其中兩漢錢幣有 475 枚，佔 97.9%；這種情況是普遍的現象。見江西省歷史博物館(劉林執筆)，〈江西南昌市東吳高榮墓的發掘〉，《考古》，1980 年第 3 期(北京，1980)，頁 219-228。

<sup>17</sup> 各類「五銖」中完好者很少，僅佔五銖總數的 7%，餘下的 93% 都是已殘損的剪輪五銖、縋環五銖、磨銖錢(「五銖」二字、輪郭被磨去)、鑿肉錢(被剪鑿而缺角)以及劣質五銖。總體來說，吳錢少見。參閱熊壽昌，〈從鄂鋼飲料廠一號墓出土錢幣看六朝墓葬隨葬錢幣的有關問題〉，收入中國錢幣學會古代錢幣委員會、江蘇省錢幣學會編著，《六朝貨幣與鑄錢工藝研究》，頁 110-113；鄂州市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鄂州鄂鋼飲料廠一號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8 年第 1 期(北京，1998)，頁 103-127；原報告錢幣統計有誤。

<sup>18</sup> 如下列未遭盜擾的孫吳時期墓葬，均無錢幣出土。南京市博物館、江寧縣博物館(祁海寧執筆)，〈南京市東善橋「鳳凰三年」東吳墓〉，《文物》，1999 年第 4 期(北京，1999)，頁 32-37；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江寧區博物館，〈南京江寧上湖孫吳、西晉墓〉，《文物》，2007 年第 1 期(北京，2007)，頁 35-49。

<sup>19</sup> 如 2002 年於湖北鄂州郭家細灣清理的六朝中型磚室墓 10 座，年代從東吳至南朝前期，只有 M2(年代為東吳至西晉)一座發現五銖銅錢一串，惟鏽蝕嚴重，具體數目不明，但總數不多(可能只有數十枚)。參閱黃義軍、徐勁松、何建萍，〈湖北鄂州郭家細灣六朝墓〉，《文物》，2005 年第 10 期(北京，2005)，頁 34-45。

研究人員統計，1956至1983年之間於鄂城清理的六朝墓共394座，僅出土錢幣7,200餘枚。重點是，這些錢幣多數出於較高規格的中、大型貴族或王侯墓中！換言之，如剔除這些中大型墓，則平均出土錢幣數可以說是非常之少。且其中約3,000枚都屬剪鑿之餘的錢，可見當時錢幣殘損之嚴重。<sup>20</sup>

考古出土實物可以視為現實社會的模擬和反映(假定其他條件不變)，出土錢幣亦然如此。古人將錢幣置於墓穴之中，並非出於偶然，或純為習俗所支配。在為死去的親人舉行葬儀之時，他們手中所握及事後投入的錢幣數量，可以視為代表墓主家庭的貨幣支付能力，而這樣的支付，本質上與日常之中買油購醋、添衣置產、送往迎來……等等經濟(亦是文化)行為中的支付並無不同。以此之故，墓葬錢幣可以反映當時幣制存在的問題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其他日常消費亦復如是)；而若古錢有減重、劣質化等等情況，更是如此。基於此一理由，上述墓葬出土錢幣數字顯示出東吳、兩晉、南朝社會的貨幣癥結，此即流通錢幣數量減少、且錢幣大量遭剪鑿破壞的長期趨勢。

除了錢幣流通數量的減少與大量剪鑿損毀外，另一個令人矚目的特點是古錢形式的多樣，以及錢幣面值與實價之間差距的複雜和不規則。1980年代河南安陽發現的窖藏古錢呈現的，正是這樣一種情況。此一窖藏古錢，內容跨期甚長，最可以代表華北地區中古錢幣考古的一般樣貌。這批安陽古錢總重5,911.1克，共計2,885枚，內容涵蓋如下：

(1)西漢時期錢幣總計34枚，包含：文帝四銖半兩6枚，武帝四銖半兩1枚，武帝至西漢中晚期五銖27枚。(2)新莽錢：「大泉五十」2枚，貨泉15枚。(3)東漢時期總計1,597枚：五銖錢496枚，「磨邊五銖」664枚，「剪邊錢」322枚，董卓五銖115枚。(4)三國時期78枚：蜀漢錢幣6枚(磨邊「直百五銖」1枚，背陰文「中」字1枚，傳形五1枚，五銖3枚)，孫吳鑄幣「大泉當千」幣1枚，曹魏五銖66枚(分素背與背有輪好郭兩種)，另外還有「太

<sup>20</sup>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學、鄂州市博物館，《鄂城六朝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6-7、291-294；馮務建，〈鄂州六朝墓出土錢幣芻議〉，收入中國錢幣學會古代錢幣委員會、江蘇省錢幣學會編著，《六朝貨幣與鑄錢工藝研究》，頁148。

平百錢」4枚與「定平一百」1枚。(5)兩晉南北朝錢幣總計 1,161 枚分別有：五銖錢 138 枚，包含：①蕭梁敬帝太平二年(557)的「四柱五銖」、「二柱五銖」；②北魏孝莊帝永安二年(529)的「永安五銖」；③北齊文宣帝天保四年(553)的「常平五銖」；④西魏文帝大統六年(540)的「大統五銖」。另外還有「五銖稚錢」、大樣「毛邊五銖」錢。還有一枚背穿上陰文「卅」字(未明年代)。

這批安陽出土古錢還包括有人工用力鑿取而成的「對文錢」(亦名「剪輪錢」、「剪邊錢」)，共計 577 枚。分別有：(1)西漢五銖對文錢 49 枚，(2)新莽貨泉(面有穿郭)對文錢 3 枚，貨泉(面無穿郭)對文錢 3 枚，布泉對文錢 1 枚，(3)東漢五銖對文錢 520 枚，(4)太平百錢對文錢 1 枚。這些對文錢錢徑大小不一，大者錢徑在 1.9 公分以上，小者不足 1.3 公分。此外，還有縲環錢 132 枚。包括：(1)西漢五銖縲環錢 15 枚，(2)新莽貨泉縲環錢 5 枚，(3)東漢五銖縲環錢 68 枚，(4)磨邊五銖的縲環錢 18 枚，(5)剪邊五銖的縲環錢 22 枚，(6)三國蜀漢直百五銖 1 枚，(7)孫吳大泉當千縲環錢 1 枚。另有記號錢，即背穿之上一星，「銖」字上一豎畫各 1 枚(未明年代)。<sup>21</sup>

相對於人工鑿取而成的「對文錢」，安陽窖藏古錢還出現有以製範澆鑄方式製造的對文五銖錢共 289 枚。最後，未鑿成縲環和對文錢的半成品共計 25 枚：包括有西漢五銖、東漢五銖、靈帝四出五銖、磨邊五銖、剪邊五銖的半成品。

安陽古錢窖藏內容跨越七個朝代，時間長達 700 餘年(西元前 175-557)，據此可推知其埋藏年代約略在陳、隋之間。在可識別年代的錢幣中，最早的是西漢孝文帝前元五年(西元前 175)的「四銖半兩」，最晚的是北齊文宣帝天保四年(553)「常平五銖」，以及蕭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四柱五銖」、「二柱五銖」。引人注意的現象是，東漢時期錢幣總計 1,597 枚，超越兩晉南北朝錢幣的 1,161 枚，而這是在經歷三百多年長期的磨損、流失、窖藏與陪葬之後遺留下來的！

<sup>21</sup> 該批窖藏為河南安陽市西郊農民某日建屋子挖地基時於土中起出。原裝為一灰陶罐，其內貯藏古錢，後來流入安陽廢品回收部門，再經搶救整理。參閱謝世平，〈安陽出土南北朝古錢窖藏〉，《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鄭州，1986)，頁36-41。

通過安陽古錢的分類和整理可以瞭解到西漢到兩晉南北朝這一長時段中發行貨幣的種類，和 700 多年貨幣沿用的概況，以及兩漢魏晉古錢在南北朝時期繼續流通的事實。尤其在出土之際，不同種類的錢幣大小互異，輕重相殊、面值各自不同，但卻都相連成一串。這一個現象表示，在同一時間，差異甚大的多種錢幣一體通用，這在貨幣史上的涵義是很清楚的：考古發掘上，古昔年代舊錢的使用，較窖藏入土之時代發行者多，表示該一時代通貨供應遠不足以滿足既有的貨幣需求，而這意味該時期通貨緊縮已然發生。

在長江下游，1981 年發掘的揚州胥浦孫吳、西晉墓 7 座，出土的古錢雖有數百枚，但都是漢末靈帝劣錢四出五銖，以及小五銖、剪輪五銖等。同批東晉、南朝墓 13 座，出土銅錢 600 餘枚，但亦都是東漢五銖和剪郭五銖之類，都非墓主生活時代鑄造的錢幣。<sup>22</sup>

2000 年 9 月清理的南京隱龍山劉宋時期墓 M1 出土的五銖提供另一個例證。隱龍山 M1 為少見的大型墓，所出五銖型式繁多，跨越數個時期，可分七型，以東漢以後所鑄各型五銖最多。若單計兩漢五銖，則已佔了全部錢幣的 90% 以上。<sup>23</sup>歷來南京地區發掘的六朝墓葬數以千計，都很少出土銅錢，有出土的亦多保存不佳，顯示錢幣品質的低劣。隱龍山劉宋墓出土錢幣種類最複雜，且數量最多，之所以如此，應該是三墓均為劉宋皇室成員(或功臣貴族)大墓，級別異於尋常之緣故。

1974 至 1975 年於南京棲霞山甘家巷發掘六朝墓群共 38 座墓，時代從孫吳到南朝，發現錢幣寥寥無幾。以未遭盜擾的 M8、M10、M16、M18、M25 這 5 座墓來說，便有 3 座未見埋有銅錢，其餘不論有無遭盜，最多亦僅餘聊聊數枚古錢而已。而其中 M7、M10、M17、M24、M29 出土金銀器共 28 件，可見錢幣之稀少，非純出於盜墓之一因。<sup>24</sup>

<sup>22</sup> 胥浦六朝墓發掘隊(吳煒等執筆)，〈揚州胥浦六朝墓〉，《考古學報》，1988年第2期(北京，1988)，頁233-255。

<sup>23</sup> 南京市博物館、江寧區博物館，〈南京隱龍山南朝墓〉，《文物》，2002年第7期(北京，2002)，頁57。

<sup>24</sup> 其中東吳墓7座，西晉墓6座，東晉墓18座，南朝墓6座，餘2座具體朝代不明。參閱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棲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

在錢塘江流域，1983 到 1984 年間杭州、蕭山清理一批土坑墓 14 座及一批磚室券頂墓 16 座，年代自西漢至南朝中期之間。這 30 座墓葬出土錢幣總共約 220 枚，其中五銖錢 200 枚(蕭M19)，大泉五十約 20 枚(蕭M21)，貨布 1 枚(蕭M21)，報告中指出，出土錢幣者均為西漢晚期至東漢早期墓，其餘皆無。同樣地，1950 年代江西發掘的 12 座漢墓與 18 座六朝墓中，漢墓中平均「一個墓僅出數枚五銖錢」，但 18 座六朝墓中則完全沒有。<sup>25</sup>

1980 年代在浙江嵊縣先後發掘的六朝墓中，東吳墓 2 座發現錢幣 21 枚，均為五銖錢(其中四枚為剪邊五銖)；西晉墓 2 座發現錢幣數為零；東晉墓 4 座發現錢幣兩枚，亦均為五銖錢；南朝墓 2 座發現錢幣 3 枚，其中五銖錢 2 枚，四銖錢一枚。嵊縣 2 座東吳墓不計，其餘 8 座兩晉南朝墓，平均每一墓葬出土錢幣不到 1 枚，數量之稀少可見一斑。<sup>26</sup>

1953 年 11 月南京南郊鄧府山發現的六朝墓出土五銖 10 餘枚。<sup>27</sup>1954 年 9 月，於無錫西門外二華里惠山公路北側壁山莊清理的六朝初期墓，雖頗具規模，但無任何錢幣發現。<sup>28</sup>1953 至 1955 年於廣州清理的六朝墓之中，大型墓有 17 座，其中發現錢幣極少，雖有五銖、大泉二千、貨泉，但數量微不足道，且都已殘蝕，取出後質軟如泥，有的僅能辨識錢文而已，說明錢幣數量稀少且品質極差。<sup>29</sup>

除上列資料外，1989 和 1992 年於湖北鄂州市石山鄉塘角頭丘陵崗地上發現的一批六朝墓，跨期極長，也很適合提供作長時段貨幣特徵的說明依據。相關單位清理了鄂州石山塘角頭古墓中的 12 座，發現該批墓葬中最早

---

1976年第5期(北京, 1976), 頁316-325。

<sup>25</sup>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繼根執筆), 〈杭州地區漢、六朝墓發掘簡報〉, 《東南文化》, 1989年第2期(南京, 1989), 頁111-128;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江西的漢墓與六朝墓〉, 《考古學報》, 1957年第1期(北京, 1957), 頁163-168。

<sup>26</sup> 嵊縣文管會(張恒執筆), 〈浙江嵊縣六朝墓〉, 《考古》, 1988年第9期(北京, 1988), 頁800-813。

<sup>27</sup> 李蔚然, 〈南京南郊鄧府山發現六朝古墓〉, 《考古通訊》, 1955年第2期(北京, 1955), 頁52。

<sup>28</sup> 此墓伴隨近百支六朝瓶出土。見朱江, 〈無錫壁山莊六朝墓發掘簡報〉, 《考古通訊》, 1955年第2期(北京, 1955), 頁40-42。

<sup>29</sup>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麥英豪執筆), 〈廣州六朝磚室墓清簡報〉, 《考古通訊》, 1956年第3期(北京, 1956), 頁29-34。

者屬東吳景帝孫休永安四年(261)，最晚者為南朝(約為初期)，時代跨越 200 餘年。12 座六朝墓中只出土包含半兩、五銖、貨泉、剪輪五銖、大泉當千等錢幣「總數近百枚」，換算平均 1 座不到 10 枚。<sup>30</sup>

學者指出：南朝墓葬俱為磚室墓，磚上均有紋飾，而不少為五銖錢紋或其他錢紋，亦非偶然，「這種現象極可能是反映當時缺錢嚴重，不得不以錢紋磚來象徵財富。因此，現存個別遺址和窖藏中所出六朝錢幣則彌足珍貴」。<sup>31</sup>

以上眾多證據無不說明，兩漢數量極多的五銖通貨，由於魏晉以後歷代的使用，磨損遺失，以及一連串的兵燹戰亂，漸至於耗竭。而這時期內各朝政府久不鑄幣，或鑄造者是市場不接受的劣幣，因受排斥而遭毀棄銷鑄，終於蕩然無存，使通縮的困境不僅長期未解，甚且歷久彌深。

反觀兩漢墓葬情況則大不然。如 1954 年清理的四川巴縣冬筍壩戰國後期至西漢墓 52 座，出土古貨幣情況如下：(1)戰國後期至秦墓，出土橋形幣、半兩錢及兩箇錢，每墓各 2 至 8 枚。(2)秦、漢之間墓，出土半兩錢，數量不多，各墓僅數枚。(3)西漢墓，有四銖、半兩、五銖錢、貨泉等出土，數量頗多，每墓在 50 到 100 枚之間。<sup>32</sup>1956 年 3 月成都東北郊發掘的 31 座西漢墓葬，共出土錢幣總數 1,458 枚，平均 1 座亦接近 50 枚左右。<sup>33</sup>

至於中古之後的隋、唐、宋，雖在唐天寶(742-756)年間以前通縮情勢依然，到了唐中期以後，才看到比較明顯的回轉。如唐代考古所見：1953 至 1954 年河南安陽大司空村的一個唐初墓葬出土隨葬器物 54 件，其中錢幣只發現「開元通寶」1 枚。<sup>34</sup>1958 年 3 月於福建漳浦縣劉坂鄉清理的 1 座中

<sup>30</sup> 據簡報(附於文末之整理表格)，顯示有出土銅錢的墓葬只有編號M4這一座，該墓葬年代屬於東吳中後期，其餘應該都沒有隨葬錢幣。據此可以判斷，兩晉南朝時期通貨緊縮之程度，尤較三國孫吳時期嚴重。參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館(李桃園、吳勁松執筆)，〈湖北鄂州市塘角頭六朝墓〉，《考古》，1996年第11期(北京，1996)，頁961-987。

<sup>31</sup> 羅宗真，《魏晉南北朝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204。

<sup>32</sup> 沈仲常、王家祐，〈記四川巴縣冬筍壩出土的古印及古貨幣〉，《考古通訊》，1955年第6期(北京，1955)，頁48-54。

<sup>33</sup>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賴有德執筆)，〈成都東北郊西漢墓葬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8年第2期(北京，1958)，頁14-29。

<sup>34</sup> 馬得志，〈安陽大司空村的一個唐墓〉，《考古通訊》，1955年第4期(北京，1955)，

晚唐墓，該墓遺物未經擾亂，於其中出土貨幣 44 枚，皆為開元通寶。<sup>35</sup>

到了宋代，雖也有陪葬錢幣較少的墓葬，但一般而言數量是顯著增加了。如 1957 年於南京太平門外新庄村未受破壞的宋代券頂磚室墓 1 座，便清理出銅錢 99 枚。<sup>36</sup>1999 年 9 月安徽無為縣發現 1 座北宋中後期磚室墓，該墓室已被破壞，隨葬器物已被民工取光，後為相關人員追回，事後統計出土(以追回者計)遺物 24 件，銅錢猶有 144 枚。1998 年 6 月於安徽舒城縣三里村北宋晚期豎穴土坑墓，出土器物 45 件，出土銅錢 473 枚。1976 年浙江麗水市蓮都區黃泥山南坡基建工地發現 1 座宋代墓葬。該墓早期被盜，並經重葬，出土遺物較少，但錢幣則不同，該墓共出土銅錢 433 枚，其中 393 枚為北宋錢。<sup>37</sup>凡此，例證很多，不一一縷舉。惟宋世紙幣已行，貨幣的數量不可能單從金屬鑄幣一方面來看；此一課題有待將來更深入研究。

除此之外，如周衛榮分析歷代錢幣金屬成份得到的數據，確認六朝錢幣品質一般遜於秦漢，此結論亦從另一側面佐證六朝幣制之窳敗。<sup>38</sup>

## (二)洛陽地區漢、晉墓葬群系統發掘資料的比較

下面表 1，作者利用較大規模發掘的洛陽燒溝漢墓群出土兩漢五銖錢幣的數量變化作為對照，以此更可以清楚地推估中古時期通貨供應吃緊的程度：

頁 54-56。

<sup>35</sup>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林宗鴻執筆)，〈福建漳浦縣劉坂鄉唐墓清理簡報〉，《考古》，1959 年第 11 期(北京，1959)，頁 608-610。

<sup>36</sup> 此墓墓頂雖頂已塌陷，但錢幣放置規律整齊，可判斷該墓未曾遭盜擾。參閱陳福坤，〈南京太平門外新庄村宋墓清理記略〉，《考古通訊》，1958 年第 12 期(北京，1958)，頁 35-38。

<sup>37</sup> 無為縣文物管理所何福安，〈安徽無為縣發現一座宋代磚室墓〉，《考古》，2005 年第 3 期(北京)，頁 95-96；舒城縣文物管理所(奚明執筆)，〈安徽舒城縣三里村宋墓的清理〉，《考古》，2005 年第 1 期(北京，2005)，頁 45-51；麗水市博物館(吳東海執筆)，〈浙江麗水市發現一座南宋墓〉，《考古》，2004 年第 10 期(北京，2004.10)，頁 93-96。

<sup>38</sup> 參閱周衛榮，《中國古代錢幣合金成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418。

表1：洛陽燒溝漢墓出土錢幣數量統計

單位：枚

分期	墓數 (a)	錢 型											合計 (b)	平均出土錢數	
		半兩	五 銖					鉛鐵環							
			I	II	磨	新	III		IV	V	剪				
一	18		67	8										75	4.2
二	20	7	168	190	8									373	18.7
三前	45		281	1,116	1,593							1		2,991	66.5
三後	22		54	242	16	649	8							969	44.0
四	8			7		22	528							557	69.6
五	10		1	15		13	1,433							1,462	146.2
六	11	1,590	2	5	11	157	125	735	16	202	鐵	1	8	2,852	259.3

說明：「分期」欄，第一期(西漢中期)、第二期(西漢中期稍後)、第三期前(西漢晚期)、第三期後(王莽及其稍後)、第四期(東漢早期)、第五期(東漢中期)、第六期(東漢晚期)。「錢型」欄，「磨」為磨郭錢之簡稱，「新」為新莽，「剪」剪輪，「環」為緹環錢。五銖則分 I、II、III、IV、V 式。平均出土錢數為(b÷a)而得出，四捨五入取到十分位。

資料來源：洛陽區考古發掘隊，《洛陽燒溝漢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頁229-239。

如表 1 所顯示，洛陽燒溝漢墓出土兩漢五銖，從東漢初年的平均 4.2 枚，到中期的數 10 枚，到最後的 200 餘枚，大致呈現出一個規律性的逐漸上升的過程，這一個過程顯現的是互東漢一代貨幣供給數量持續增加以及長期的通貨膨脹趨勢。<sup>39</sup>

洛陽地區西晉時期的墓葬，考古學者亦曾進行系統的考掘。1953 到 1955 年間由蔣若是、郭文軒等學者組成的研究團隊，總共發掘清理出 54 座西晉墓，其後寫成〈洛陽晉墓的發掘〉一文發表。

這次發掘的西晉墓葬分為豎穴墓和洞室墓兩種，共出土銅錢 2,060 枚，包括「半兩」19 枚，「五銖」1,969 枚，「大泉五十」9 枚，「貨泉」52 枚，「大泉當千」5 枚，「直百五銖」4 枚，「太平百錢」、「定平一百」各 1 枚。

<sup>39</sup> 東漢晚期則是一大變局。漢末墓葬多見隨葬當時的粗劣五銖，常達數百枚，甚至數千枚，極為浮濫。如武威雷台東漢墓出土總數約 2 萬 8,000 餘枚(其中殘破者約 7,000)，西漢五銖和新莽錢也時有發現。參閱王仲殊，《漢代考古學概說》(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100；甘肅省博物館，〈武威雷台漢墓〉，《考古學報》，1974 年第 2 期(北京，1974)，頁 104-105。



經統計，平均一座西晉墓有各式銅錢 38.2 枚。<sup>40</sup>這樣一個數字，對照洛陽燒溝兩漢墓葬群，大約等於退回到第二期(西漢中期稍後)以前的階段。不過，考量到西晉墓葬所出幾乎全屬前代鑄幣之遺留，且形制紛繁雜亂，交易困難，故若就當時貨幣交易的「流量」考慮，則上列平均之數字勢必要打些折扣，方為近真。

往下一直到東晉、南北朝、隋唐諸時段，雖缺乏較大規模的發掘資料，但零星的考古清理工作一直都在進行之中。從累積至今零散但數量眾多的考古出土記錄和資料，仍可以粗略地推估東晉以後的發展。不過，若就數據之品質和科學價值而言，後來分散零星的考古發掘成果報告，自然仍不能和《洛陽燒溝漢墓》和《洛陽晉墓的發掘》等齊。

今據《洛陽燒溝漢墓》與《洛陽晉墓的發掘》兩份具代表性文獻，再綜合其他考古資料，<sup>41</sup>將東漢中期以後至魏晉南北朝、隋唐的貨幣(銅錢為主)流通以折線圖模擬如圖 1。<sup>42</sup>

<sup>40</sup>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蔣若是、郭文軒執筆)，〈洛陽晉墓的發掘〉，《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北京，1957)，頁169-185。原報告「大泉當千」枚數缺載，茲照其總數計算補入。

<sup>41</sup> 如前述1974年發掘的南京棲霞山甘家巷38座墓葬，跨期從孫吳到南朝，錢幣只有零星數枚。又如南京市博物館、雨花台區文化廣播電視局(祁海寧、陳大海執筆)，〈南京市雨花台區南朝畫像磚墓〉，《考古》，2008年第6期(北京，2008)，頁43-50；南京市博物館(李翔執筆)，〈南京市江寧區胡村南朝墓〉，《考古》，2008年第6期(北京，2008)，頁51-57；南京市博物館(祁海寧、張金喜執筆)，〈南京市棲霞區東楊坊南朝墓〉，《考古》，2008年第6期(北京，2008)，頁36-42，這三墓中只有東楊坊出土劉宋「元嘉四銖」2枚。以六朝考古而言這些資料具高度代表性，基本上已可作為描述該時期貨幣特徵的基礎。

<sup>42</sup> 魏晉南北朝的通縮，延續到盛唐，甚至盛唐以後。考古所見唐代墓葬錢幣多在0枚至10數枚之間(0枚的情況較多)，稍優於南北朝。例如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司馬國紅等執筆)，〈河南洛陽市龍門鎮唐墓發掘簡報〉，《考古》，2007年第12期(北京，2007)，頁50-55，該墓出土錢幣數即為0。這方面相關資料極多，因篇幅關係，此處不予俱引。墓葬錢幣數量於中唐以後略有增加，但與兩漢相比，還是遠遠不及。這種鑄幣總量仍極為稀少的狀態，不足以改變隋、唐通貨缺乏的情勢。我們姑且引據貨幣史大師彭信威的權威論斷：「盛唐物價之所以低，……是錢幣不夠」，「在錢幣的供應上，自然感到緊張」，彭氏還指出，自德宗(780-805在位)貞元(785-805)以後，「發生一次通貨緊縮的現象，前後鬧了六七十年」。彭信威的說法，意味著唐帝國絕大多數時間面對的是一個持續性通縮的局面。此一見解可以作為本文論點的補充。參閱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245-2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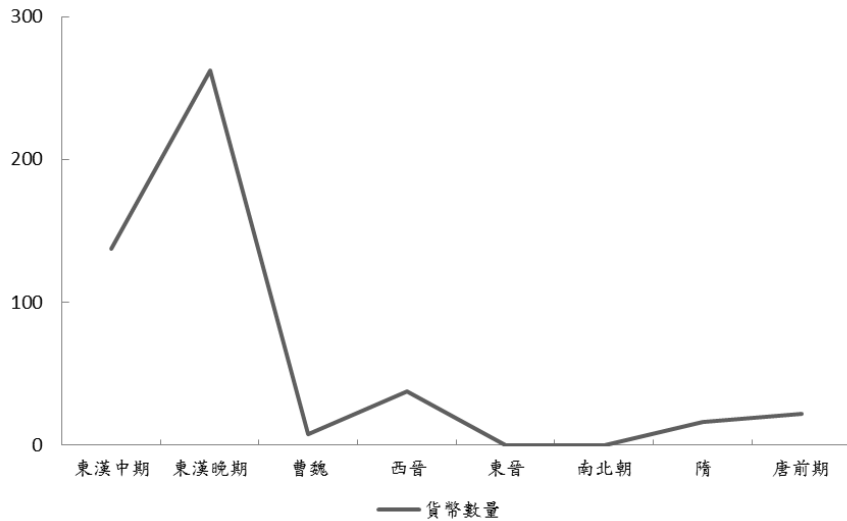


圖1：公元二世紀至七世紀貨幣數量變化示意圖

圖1基於墓葬出土資料，模擬中古時期及其前後階段貨幣數量變化趨勢。要說明的是，該圖忽略了三國時期與南北朝階段的南北差異，也未反映各朝代政權名目貨幣數量的短期或突然的變化(如梁武帝的發行鐵錢)，同時也未對貨幣存量和流量之不同做出區別，當然也沒有將布帛等「實物貨幣」納入估計，<sup>43</sup>其主要作用在於「概略地」作為漢末以前和曹魏以後兩個長時段貨幣演變趨勢的對照。

雖然洛陽和建康兩地墓葬的資料數字僅僅可以看作局部地區的抽樣代表，不可能與全國各地的實際情況百分之百符合，但作為晚漢中古隋唐貨幣演變的概略模擬，大體仍可成立。尤其洛陽是漢、晉、北朝、隋、唐各代政治、經濟中樞，建康(建業)亦為六朝帝京所在，人文薈萃，與時代的變遷息息相關，因此具有的代表性遠高於其他地區。而如上文所述，文獻所載中古以銅錢作為交易工具的頻率不及兩漢，範圍亦遠較兩漢退縮，考古發掘錢幣數量亦相對稀少，因此得出中古、六朝以迄於唐前期這段歷史中

<sup>43</sup> 圖1之內容未包含實物貨幣，乃因實物貨幣「流動性」低，與金屬鑄幣迥然不同。參閱前註14之說明。

通貨供給緊縮的時代特徵。

早先何茲全先生曾提出一種說法，認為東晉南朝錢幣的缺乏不是「絕對的缺乏」，而是「相對的缺乏」。他的理由是當時「錢貨的數量，可能已經很大，但與社會的需要相較，仍是供不應求，因之造成貨幣缺少的現象」。<sup>44</sup>但由上述諸多資料與事實可證何氏此說並不正確。這些資料與事實顯示的是：六朝錢幣的缺乏恰恰是絕對性的！且流動性不足的情況足以造成社會經濟的拖累作用。

### (三) 中古六朝貨幣撮要整理：文獻史料的綜述

在綜合整理兩漢至梁、隋考古資料代表的訊息之後，作者根據傳統文獻史料，將中古六朝 400 年間的貨幣演變，簡單撮要整理如下：

董卓之亂後(大量發行小錢，190)，以漢五銖為主的貨幣體系加速崩潰，以物易物的模式形成。<sup>45</sup>此後，三國魏、蜀、吳政權均曾不同程度地試圖擺脫幣量太少的窘態，但舉措並未得法，故整個三國時期均未回復到兩漢的常軌。魏國初建，曹操主控中原政局之際(曹氏受封「魏公」，213)，「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sup>46</sup>證明此時錢幣稀少，已產生物價下跌、通貨緊縮的現象；雖然考古資料顯示曹魏政權也曾經鑄錢，但通貨不足的現象延續至魏、晉禪代以後，沒有任何改變。

在六朝之初，文獻上記載孫吳政權鑄行「大泉五百」(嘉禾五年，236)、「大泉當千」(赤烏元年，238)等虛價大錢，考古則有「大泉二千」在浙江黃岩、紹興、廣東廣州、湖南長沙等地發現，「大泉五千」則有泉學界的實品收藏，以及磚印記錄。<sup>47</sup>錢幣價值的大量灌水表明此時已發生「通貨膨脹」。

<sup>44</sup> 何茲全，〈東晉南朝的錢幣使用與錢幣問題〉，頁48-49。

<sup>45</sup> 關於東漢末年桓、靈之際的貨幣動盪，以及董卓發行小錢所造成的貨幣崩潰之始末因由，目前已有比較完整的發微和梳理，參閱陳彥良，〈東漢長期通貨膨脹——兼論「中古自然經濟」的形成〉，《清華學報》，新41卷4期(新竹，2011.12)，頁669-714。

<sup>46</sup> 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5)，卷26，〈食貨志〉，頁794。

<sup>47</sup> 如1956年12月浙江黃岩秀嶺水庫晉墓發掘中，出土4枚大泉五百、10枚大泉當千、1枚大泉二千。參閱王賞忱、劉至颺，〈三國孫吳鑄錢問題探討〉，《中國錢幣》，1983年第3期(北京，1983)，頁21-2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黃岩秀嶺水庫古墓

但另一方面，考古資料亦顯示孫吳時期鑄幣數量有限。此外，由於孫吳大錢面值太大，不便流通，且其發行時間短暫，這些因素導致貨幣與商品交易的萎縮。依照貨幣流量理論的觀察，商貨不行、交易稀少以及錢幣壅滯不流，即意謂此時又將呈現「通貨緊縮」的狀態。蜀漢的直百五銖(214)、太平百錢等通貨情況與東吳類似而稍優，故蜀錢流通範圍可以涵蓋東吳。<sup>48</sup>

兩晉(266-420)約一百五十年間鑄幣無聞，因而出現更嚴重的錢荒，貨幣流通更為欠缺，延長了通貨緊縮的困局。這從兩晉墓葬出土錢幣數量極少(較三國吳墓稀少，更不及兩漢)的情況可以證實。東晉(317-420)時期，如《晉書》，卷26，〈食貨志〉云：「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sup>49</sup>表明晉室南渡之後雖然有沈充鑄造的小錢，但因數量不多，整體來說，仍未能根本緩解錢重物輕、通貨緊縮的壓力。

劉宋(420-479)之初，為改變前朝的錢荒，以及「形式不均，加以剪鑿」的問題，<sup>50</sup>故在其統治早期的宋文帝元嘉七年(430)鑄行「四銖」，然不久即輕劣化；中期與晚期則發行「孝建四銖」(454)、「二銖」(465)等小錢。這些減重發行的做法直接造成的影響，就是錢幣貶值與通貨膨脹。而隨之而來的後果，與其他時代虛價劣錢流通不便、困扼商業的情況若合符節。更複雜的是，元嘉四銖的鑄造量太少，遠不足以應付當時的貨幣需求，於是兩漢以來尚在流通的優質古錢遂被剪鑿，因發錢幣劣化的風潮，「競竊翦鑿，銷毀滋繁」的結果，好錢「歲月增貴」，因之「貨貴物賤」、「貧室日虛」。<sup>51</sup>此外，「孝建以來，又立錢署鑄錢，百姓因此盜鑄，錢轉偽小，商貨不行」，

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8年第1期(北京，1958)，頁124-125；王儷閻，〈孫吳錢幣及其鑄造工藝〉，頁7。大泉五千的收藏，參看丁福保，《歷代古錢圖說》(臺北：和平出版社，1986)，頁59。

<sup>48</sup> 如前述南昌東吳高榮墓的發掘出錢幣485枚，其中便有蜀漢鑄造的「直百五銖」(極少數，其他多為兩漢古錢)。又如2003年於鄂州新廟茅草村清理孫吳早、中期之際家族墓葬出土銅錢中亦有蜀漢所鑄直百五銖、太平百錢、太平百金、定平一百、直一等錢。見江西省歷史博物館(劉林執筆)，〈江西南昌市東吳高榮墓的發掘〉，頁219-228；余林森、徐勁松、余夏紅、謝四海，〈湖北鄂州新見太平百金及相關問題探討〉，《中國錢幣》，2008年第2期(北京，2008)，頁17-22。

<sup>49</sup>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26，〈食貨志〉，頁795。

<sup>50</sup> 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75，〈顏竣傳〉，頁1962。

<sup>51</sup> 沈約，《宋書》，卷66，〈何尚之傳〉，頁1736。

導致鵝眼、縲環之類劣錢充斥。<sup>52</sup>這樣的敘述，亦說明其始因官方錢署鑄錢，遂而啟導盜鑄的發生；兩者因果關係是非常明確的。

劉宋末季為因應通貨輕劣化的衝擊，翻然改途，規定本朝發行之新錢一律廢止，但如此一來緊縮的情況更為惡化。此一危亂情勢為繼起的南齊所承接，導致終南齊一代「圜法久廢，上幣稍寡」，「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sup>53</sup>蒙受錢幣短缺、物賤錢貴的深重打擊。

蕭梁受禪(502)，立即展開鑄幣(天監五銖與「公式女錢」)，但手段幾近於掘苗助長。<sup>54</sup>自普通四年(524)起梁武帝破天荒且大量地發行鐵錢。因鐵賤易得，私鑄轉盛，通貨膨脹的態勢隨之高漲，市場交易再一次受到名目價格變化的簸盪而遭受重挫。再則因鐵錢易朽，加上蕭梁吏治的腐化，國家鑄幣機構的墮敗導致鐵錢數量和流通的快速衰落，於是在鐵錢發行後期的中大同(546)以後有「短陌」的出現，貨幣緊縮的陰影在鐵錢消失於市場之中的同時擴大蔓延。<sup>55</sup>

梁末，徒然做了一些乍起乍落的改鑄措施(「太清豐樂」，547；以及兩柱錢、鵝眼錢、細錢、四柱錢)，只有增加貨幣擾動的頻率，加重了破壞的力道。蕭梁末代的敬帝繼位，立即「班下遠近，並雜用古今錢」(556)，<sup>56</sup>這一次下

<sup>52</sup> 沈約，《宋書》，卷7，〈前廢帝紀〉，頁143；沈約，《宋書》，卷75，〈顏竣傳〉，頁1963。

<sup>53</sup> 蕭子顯，《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3，〈武帝紀〉，頁54；蕭子顯，《南齊書》，卷40，〈竟陵王蕭子良傳〉，頁696。

<sup>54</sup> 1997年於江蘇鎮江發現蕭梁官方鑄錢遺址，其中輕薄錢範佔整出土範片的90%以上，可證於梁初減重現象已經出現。參閱劉建國，〈論梁五銖與公式女錢——從鎮江蕭梁鑄錢遺址的發現談起〉，《中國錢幣》，1999年第2期(北京，1999年)，頁16-21；鄒志諒，〈鎮江南朝蕭梁五銖錢範考察〉，《中國錢幣》，1999年第1期(北京，1999年)，頁40；范衛紅，〈南朝鑄錢工藝、鑄錢機構及鑄錢特點芻論〉，收入中國錢幣學會古代錢幣委員會、江蘇省錢幣學會編著，《六朝貨幣與鑄錢工藝研究》，頁163-171。

<sup>55</sup> 川勝義雄〈侯景之亂與南朝的貨幣經濟〉一文是探討蕭梁代社會政治變遷的一篇力作，蘊含許多深刻的見解。該文缺乏的是貨幣之政策與「貨幣經濟」的互動的探討。關於蕭梁一朝鐵錢和「短陌」以及通縮的關聯性，作者已給予詳細分析釐清。參閱川勝義雄著，夏日新譯，〈侯景之亂與南朝的貨幣經濟〉，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4卷，頁247-293；陳彥良，〈梁、陳幣制變動和通縮通脹——鐵錢與「短陌」的形成新探〉(未刊稿)。

<sup>56</sup> 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8，〈梁本紀下〉，頁248。

詔，代表政府承認過去推行的所有幣制已全然失敗。不過，到了次年，梁政府又改發行四柱錢(557)，且十餘天內兩次變換錢幣的比價，<sup>57</sup>顯示改制的頻促與混亂到達了極點，最後伴隨了梁朝的滅亡。「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sup>58</sup>表明陳朝建國之初，先前由梁武鐵錢引發的通貨膨脹情勢，到這時候，像鐘擺一樣又盪回到通貨緊縮的另一個極端。<sup>59</sup>

北朝方面，北魏太和十九年(495)之前 100 餘年間未曾鑄幣，這年之後始先後發行太和五銖(495)、永平五銖(510)、永安五銖(529)，但鑄造都不精，數量亦少，通貨緊縮的情勢無能緩解。而因幣制敗壞，偽劣風行，北魏末季呈現「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沉」，<sup>60</sup>以及「巧偽既多，輕重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的局面，<sup>61</sup>不僅貨幣的緊縮性危機持續深化，且將之推向混亂性崩潰的邊緣。

至於東魏，先沿用永安五銖，但盜鑄極盛，「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sup>62</sup>貨幣之混亂，堪稱北朝之最。但北魏、北齊之私鑄，就史例所見，其實多為權豪或戚貴所為，其與官府原為一體之兩面，而與官鑄亦僅一線之隔，或甚至官府主動所為。<sup>63</sup>往後高歡沿用永安五銖之舊名更鑄新錢，但不久「漸復細薄，姦偽競起」。<sup>64</sup>其後高洋改鑄常平五銖(550)，一開始製造甚精，但

<sup>57</sup> 史云：「四月己卯，鑄四柱錢，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錢一准十。丙申，復閉細錢。」從四月己卯到壬辰只間隔13天，再到丙申只間隔3天，可見這麼短暫時間之內便改制3次。見李延壽，《南史》，卷8，〈梁本紀下〉，頁250。

<sup>58</sup> 魏徵，《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24，〈食貨志〉，頁690。

<sup>59</sup> 南北朝之時，北朝通縮之嚴重猶過於南朝。岡崎文夫從《南齊書》，卷3，〈武帝紀〉，詔敕中「貧室盡於課調，泉貝傾於絕域」看出南朝錢幣流入北朝可以證明。見岡崎文夫，《南北朝に於ける社會經濟制度》(東京：弘文堂，1967)，頁136；蕭子顯，《南齊書》，卷3，〈武帝紀〉，頁54。

<sup>60</sup> 魏收，《魏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77，〈高崇附子高恭之傳〉，頁1716。

<sup>61</sup> 杜佑，《通典》，卷9，〈食貨九〉，頁195。

<sup>62</sup> 魏徵，《隋書》，卷24，〈食貨志〉，頁690。

<sup>63</sup> 如《魏書·崔休傳》云：崔休(472-523)的兒子「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為尚書庫部郎。坐兄悛鑄錢事發，闔家逃逸。數日，叔義遂見執獲」，便是一例。又如北齊王則(502-549)「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則性貪憚，在州取受非法，舊京取像，毀以鑄錢，于時世號河陽錢，皆出其家」。見魏收，《魏書》，卷69，〈崔休傳〉，頁1527；李百藥，《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20，〈王則傳〉，頁272。

<sup>64</sup> 杜佑，《通典》，卷9，〈食貨九〉，頁196。

一二年之間，即開始濫惡。迨高氏政權滅亡之際，混亂一如北齊之初年，甚至有所超越。

宇文周(557-581)早期與北魏初期的通縮相似，其後周武帝因強烈之財政需求，先後發行布泉(561)、五行大布(574)、「永通萬國」(580)等錢，但都是價值灌水、名目遠過於實質的膨脹性錢幣，無不以失敗告終，最後為隋氏廢除。這樣，一直到隋初開皇(581-600)年間，天下復歸一統，五銖亦再次發行，而史書上仍說這時「江南人間錢少」，<sup>65</sup>說明隋初通貨仍然不足，緊縮的情況沒有顯著改變。隋後期則由於諸王鑄幣，及煬帝的弛縱，再一次引發貨幣的大騷動，間接促成隋帝國的崩解。

簡單地說，南朝從劉宋建國一直到陳朝滅亡，北朝從魏初到隋末，緊縮與膨脹循環的格局無一刻不存在，也因此社會經濟的發展從未能真正走上健全之途。至於李唐建國一直到初、盛之際，一方面，政府專鑄制度亦無法徹底擺脫通縮的困局，另一方面，膨脹性擾動的因素雖有所緩和，但國家鑄幣機構內部的腐敗仍提供滋生之機會，中古時期的貨幣特徵因而持續延宕，未有根本性的突破。僅舉一例，史載肅宗乾元(758-760)年間：「諸鑪鑄錢窳薄，鎔破錢及佛像，謂之『盤陀』，皆鑄為私錢」，<sup>66</sup>可以佐證唐代偽劣之「私錢」其實是由官方鑄局內部人員流出。對於民間盜鑄的擴散蔓延，這類腐敗為無疑要起示範啟導的作用。

綜觀魏晉南北朝至唐初通貨的膨脹與緊縮的歷史，可以發現貨幣動盪的產生與鑄幣者(包括官鑄與私鑄)的行為結果密切相關，而其根源則在於歷代統治者的政策。誠如杜佑觀察到的：

其後言事者，或惜銅愛工，改作小錢，或重號其價，以求贏利，……

令盜鑄滋甚，弃南畝日多，雖禁以嚴刑，死罪日報，不能止也。<sup>67</sup>

這一段話清楚指明，魏晉南北朝大多數執政者的發行政策，不是在鑄造時「惜銅愛工，改作小錢」，就是人為地「重號其價，以求贏利」，兩種行為都使得貨幣的法定價值(法定購買力)偏離了它本身的市場價值(真實購買力)，而

<sup>65</sup> 杜佑，《通典》，卷9，〈食貨九〉，頁198。

<sup>66</sup> 歐陽修，《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卷54，〈食貨四〉，頁1386。

<sup>67</sup> 杜佑，《通典》，卷8，〈食貨八〉，頁168。

導致盜鑄的猖獗和幣制的失敗。

此外，如學者所指，六朝鑄錢技術有很大的進步，主要表現在疊鑄式陶質錢範的改良。尤其「蕭梁一個範包可鑄公式女錢約 240 枚，就每一範包出錢而言，效率提高為(三國時期東吳的)24 倍」。但錢幣鑄造的效率不一定保證貨幣制度的成功，因為它可能更像今天的印鈔機，加快了政府製造通膨的速度，進一步激化貨幣的動盪，蕭梁一朝恰是顯例。<sup>68</sup>

而因戰亂頻仍，這時期出現甚多掘地或投井以藏錢的事例，如西晉鮑瑗(生卒年不詳)「浚井，得錢數十萬」；東晉初王導(276-339)亦曾「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兩晉承漢末及永嘉喪亂之後，這種藏匿錢幣的風氣，無形中加深通貨不足的嚴重性。而在灌水發行以及輕小劣錢當道之際，這些窖藏多以優質好錢為之，如《南齊書》載：永明七年(488)齊興太守「於塹中獲錢百萬，形極大，以獻臺瑞」；十年(491)齊安郡民王攝掘地得「四文大錢」12,710 枚，「品製如一」，這些都是優質好錢遭到窖藏的例子。呂思勉指出：「古人本有埋錢之風，當惡錢盛行之日，必更有甚焉者，此亦錢乏之一因歟！」從錢幣減重導致窖藏盛行一事觀之，這時期顯示通貨膨脹與通貨不足往往伴隨發生。<sup>69</sup>

### 三、中古貨幣史的兩個悖論

#### (一) 中古六朝貨幣的兩個「流動性悖論」

綜合分析這一個歷史階段的演變，可以發現中古、六朝貨幣史的內涵呈現兩個難以解決的流動性悖論：

<sup>68</sup> 關於六朝鑄幣技術的卓越成就，可參閱鄒志諒，〈中國錢幣鑄造工藝史上燦爛的一頁——六朝疊鑄式陶質錢範的演進與成效〉，《中國錢幣》，2003年第1期(北京，2003)，頁8-13。

<sup>69</sup> 這意味著下文所言的第二種悖論已然出現。此段引文俱見房玄齡等撰，《晉書》，卷95，〈淳于智傳〉，頁2478；房玄齡等撰，《晉書》，卷65，〈王導附子王悅傳〉，頁1754；蕭子顯，《南齊書》，卷18，〈祥瑞志〉，頁364；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頁1112。



悖論之一，就錢幣的法定「面值」(denomination)而言，魏晉南北朝質量降低(debasement)、價值灌水的錢幣表現出「通貨膨脹」的樣貌，然而就其發行的「數額」(quantity)而言，則反而又呈現出「通貨緊縮」的狀態。出現此一弔詭的原因是：一方面，這時期各朝政府發行者多為虛價的劣錢，另一方面，小額面值銅幣發行數量又長期不足，而大額面值銅錢本身的不可分割，且數量上同樣稀少，故造成這一時代在通貨膨脹的格局中，連帶地顯現出通貨缺乏、流動性不足的現象。

悖論之二，就貨幣的「存量」(stock)方面來考量，在這時期每一次錢幣發行的過程中，輕賤、減重、劣質化通貨流通的迅速泛濫，代表其時已然出現貨幣貶值、「通貨膨脹」的趨勢。然而從貨幣的「流量」(flow)的角度觀察之，由於很快地人們便對這些數量泛濫的小錢的產生排斥心理，開始拒絕使用，甚至出現窖埋優質好錢的行為(見前)，這些現象與行為使得錢幣急速退藏、流動性大降，市場難以靈活運作，買賣減少，商品交易量萎縮，於此無疑又顯示出「通貨緊縮」的癥候。<sup>70</sup>重點在於，當新的通貨發行之後，「面值」的灌水以及發行「數額」的稀少這兩個特性是「同時」存在的；其次，由於中古六朝無數次發行劣錢的經驗，人們已經形成穩定的預期，所以在新錢推出之時市場(幾乎)「同時」出現排拒劣(新)錢、窖藏好(古)錢的行為。

綜合上述兩個悖論，或許可以簡單地歸納：公元 3 至 6 世紀中國的貨幣演變，乃為一「長期通貨緊縮格局下更迭發生膨脹性擾動」的過程。藉由深入考察可以得知，一方面，中古時期的通貨緊縮不單情況嚴重而且歷時極長，因此形成的是一個「長期通貨緊縮」的貨幣格局；另一方面，每

<sup>70</sup> 如南朝宋永光、景和(同為465)間發生的「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的案例，從錢幣的急速貶值，到商貨不行、交易停頓，這是由「通膨」急轉為「通縮」的鮮明例子。見沈約，《宋書》，卷75，〈顏竣傳〉，頁1963。陳啟天(1893-1984)描述中國在1949年左右的經濟危機時，曾敏銳地觀察到，當時經歷的，正是「通貨繼續膨脹下，一面通貨表現膨脹，一面通貨表現緊縮」的詭異情勢，他指出原因道：「蓋物價與通貨數量失其均衡，故時而物價高漲，超過通貨流通之數量，時而通貨流通之數量超過物價高漲之程度」。此一因國府金圓券(以及更早的法幣)發行的泛濫而引發的貨幣混亂與市場動盪、進而導致交易極度萎縮的狀態，恰可與本書描繪魏晉南北朝的情況相互發明。參閱陳啟天，《寄園回憶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頁238。

一次新錢在發行之後，不但減重、輕劣化的發展極為迅速，且在這一個時代，快速貶值的現象一再地複製，每一次均造成市場中價格的嚴重波動，延續而造成不斷而頻繁的漲跌紛擾，因此遂有「膨脹性擾動」的更迭出現。由此可見，往昔史家多將此一階段(特別是東晉、南朝)的貨幣流通情況，描述為「錢幣之勢力在南方尚未消滅」、「可見錢在社會上之勢力」、「可見錢幣勢力之存在」，這類說法固然不錯，但就貨幣這一變數，如何對於社會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的認知，幫助其實不多。<sup>71</sup>

總之，根據前文的理解，可以認為長期通貨緊縮的格局之下膨脹性擾動的更迭發生這一事實，構成了中古時期貨幣與經濟史的最為突出的特徵。

中古、六朝貨幣的雙重悖論，不僅代表魏晉南北朝 400 年經濟與貨幣長期發展的時代特性，這樣的情況客觀上也對於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發展的遲滯與進展的緩慢帶來難以擺脫的影響。通膨與通縮並存的雙重悖論，可以作為理解魏晉南北朝幣制問題的根源及其時代意義的基礎。作者認為，此一悖論揭示的，正是「中古自然經濟」的時代格局中，國家主導貨幣之模式衍生的兩股破壞性力量的本質面貌。

## (二) 中古自然經濟相關問題的檢討

誠如吳榮曾先生對自然經濟和貨幣經濟差異的解釋：

自然經濟和貨幣經濟一般是不相容的，只要社會上多以穀帛為市，貨幣經濟就必定受到制約或損害。儘管這時期貨幣並未都退出流通，但數量上較之過去大為減少。從曹魏到兩晉，政府鑄造、發行錢幣的活動基本停止。在市場上流通的主要是古錢和各種私鑄錢。……這和流通中錢幣數量少有關。……故私鑄的盛行，不可避免地會使大量的減重貨幣充斥於市，這將會促使貨幣秩序的更加混亂。於是有人以為不如廢除錢幣，用穀帛為貨最好；也有人主張鑄造足重的五銖，想以良幣來驅逐劣幣。但實踐的證明是，由於新錢

<sup>71</sup> 李劍農，《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頁76-77。

數量不太多，結果仍是劣錢在驅逐良錢。<sup>72</sup>

吳氏正確地指出，自然經濟和貨幣經濟是「不相容」的，「只要社會上多以穀帛為市，貨幣經濟就必定受到制約或損害」。這樣一個認識，顯然比往昔史界曾流行的，實物貨幣亦可以實現貨幣經濟之類的論調，要高明得多。吳氏指出的事實，中古文獻史料所見甚多，如北魏孝明帝熙平(516-518)年間任城王元澄(467-519)指出的：「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疋為尺，以濟有無。至今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錢貨，實非救恤凍餒，子育黎元」。元澄的說法，描述的就是實物貨幣為北魏帶來經濟凋弊的窘況，證實貨幣經濟之不發達，必然導致民生艱困的結果。對於錢幣與實物的差異，元澄又道：「錢之為用，貫織相屬，不假斗斛之器，不勞秤尺之平，濟世之宜，謂為深允」。相對於此，「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sup>73</sup>造成之不便實遠過於錢幣的使用。這些說法無不可以支持「以穀帛為市，貨幣經濟就必定受到制約或損害」的正確論點。

吳氏同時指出魏晉南北朝貨幣動盪的表現和它的原因：「政府鑄造、發行錢幣的活動基本停止」，錢幣「數量上較之過去大為減少」，「減重貨幣充斥於市」促使「貨幣秩序的更加混亂」。這一見解，顯然也比那種兩漢留下來的通貨數量足供後世六朝使用而不虞匱乏的論調合乎實際，且遠為深刻。

有學者認為：「六朝布帛貨幣的存在，起到的是一種高品位貨幣的職能。它在當時貨幣領域中的作用和地位，是金屬鑄幣所無法取代的」，<sup>74</sup>這種說法有很大的片面性，是不恰當的。這是因為，倘若六朝貨幣制度健全，則布帛的貨幣地位當然可以被取代(或回歸到它作為非常規性貨幣的位

<sup>72</sup> 吳榮曾，〈鵝眼錢考辨〉，《中國錢幣》，1995年第2期(北京，1995)，頁42-44。傅築夫也有類似的看法，見傅築夫，〈貨幣經濟的衰落與實物貨幣的代興〉，頁756。

<sup>73</sup> 魏收，《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864-2865。

<sup>74</sup> 劉建國、高嵐，〈試論六朝錢帛貨幣的歷史地位〉，《江漢考古》，1989年第2期(武漢，1989)，頁95-103。有學者更說：「南朝貨幣雜行，發行量小，並不說明當時經濟衰退，商業蕭條」，這是因為物物交換之下貨幣「未完全起到應起的作用」。這樣的推論超越了貨幣史的一般常識，與東晉、南朝幾次貨幣爭論發生的背景亦相互扞格，已不是我們所能臆度的了。參閱羅宗真，《魏晉南北朝考古》，頁204。

置)，而使整個貨幣制度走向較為正常的軌道。這樣看來，假定六朝金屬鑄幣真的不能取代布帛，正確地看法是應該歸咎於國家整體貨幣政策的失敗，而不應該片面地強調布帛的成功。

在其他許多地方，中古貨幣的研究與認識仍存在著不一而足的問題。舉例來說，《南齊書》，卷 26，〈王敬則傳〉載竟陵王蕭子良於蕭齊永明二年(483)的一份奏疏，其中有話提到：

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sup>75</sup>

有學者引用這段文字，指說：「絹價最貴的時候就是南渡之初，從南渡到齊永明 167 年間，絹價持續下跌，最後只剩南渡之時的 10%，但這也反應(映)出政府和民間的消費部門，對錢的倚賴與日俱增」。<sup>76</sup>這裡牽涉到的，是對於整個魏晉南北朝貨幣與經濟歷史有無正確把握的問題，所以至關重要，值得細辨。事實上，「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一語，指的是南渡初期戰亂之餘，四境擾攘，物資奇缺，故物價昂貴。以後局面稍穩，生產比較回復，況且自南渡之後，東晉政府鑄錢無聞，且經劉宋一朝，「年歷既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滅，貨薄民貧，公私俱困」，<sup>77</sup>錢幣流通不足，長期緊縮，故物價相對於錢價遂呈跌落之勢。到宋、齊之間，通膨與通縮問題更是絡繹循環，多次反復。所以根據「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便說東晉以後「對錢的倚賴與日俱增」，是一種過於機械的推論。這類說法忽略了貨幣的動盪對於東晉南朝社會經濟造成的限制與傷害這個時代的大脈絡，委實不足取法。

更明顯的，就在永明五年(486)，齊武帝蕭曠正自承認，「農桑不殷於曩日，粟帛輕賤於當年，……良由圜法久廢，上幣稍寡」而引起。<sup>78</sup>而永明二年(483)蕭子良也已投訴：「穀價雖和，比室飢嗷；縑纈雖賤，駢門裸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sup>79</sup>說明此時物價之低迷，並未給民眾帶來任何好處，

<sup>75</sup> 蕭子顯，《南齊書》，卷26，〈王敬則傳〉，頁483。

<sup>76</sup> 王怡辰，《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頁127。

<sup>77</sup>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5)徐爰所說的話。見沈約，《宋書》，卷75，〈顏竣傳〉，頁1961。

<sup>78</sup> 蕭子顯，《南齊書》，卷3，〈武帝紀〉，頁54。

<sup>79</sup> 蕭子顯，《南齊書》，卷40，〈竟陵王蕭子良傳〉，頁696。

反而帶來饑寒交迫的痛苦。這亦是通縮的明證。何況在同一份奏議子良還說：「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這句話已明確指明錢貴物賤、通貨緊縮在蕭齊一朝是普遍地存在的事實。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奏議中又說：「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則束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為刻上，今為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永初(420-422)是劉宋開國劉裕的年號，元嘉(424-453)是宋文帝劉義隆年號。這段話所指，正是宋、齊兩代通縮、通膨循環發生、相繼而至的情況，以及賦稅制度在通縮、通膨循環的背景下並未隨時轉變，造成刻剝小民，以至於發生「氓庶空儉」，「道路愁窮，不可聞見」的後果。故蕭子良苦心建議，「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其應送錢」，即建議彈性地讓他可以物代錢。

可以清楚看到，整件事情發展到如此，是因為數十年來，混亂、稀貴的「錢」以及僵化、繁苛的「稅」這兩個因素，已經對下層百姓產生極端不利的影響。循此之故，如果對於該一時代貨幣與經濟之實況有一個稍微深入的認識，便可以知道「對錢的倚賴與日俱增」、「用錢交易的範圍愈來愈廣」這類說法，從某種角度看似不全錯(事實上，在通縮與通膨並存交至的貨幣結構之下，「用錢交易的範圍愈來愈廣」，也可能意味著市場受錯誤的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愈來愈大)，但與歷史的實際發展是頗有距離的。類似的見解，可以說都是在未能審知該一時期通縮與通脹的嚴重性，以及察覺其對社會經濟的危害的情況下而出現的。

不過，何以中古貨幣史會呈現上述的兩個悖論？概括言之，那是由於中古六朝時期在長期通縮的格局之下，由於政府財政上的極大壓力，觸發了歷代各朝廷實施貨幣改鑄的意圖，而為了比較快速地求取鑄幣稅，貨幣的改鑄多以價值灌水的方式行之，以此引發通貨膨脹與貨幣混亂的情勢。而正因為不當的貨幣政策的推行，「劣幣驅逐良幣」的負向格雷欣法則(Gresham's Law)機制被啟動，政府的濫鑄小錢和私人的偽鑄劣幣共同激發新一波更為嚴重的通貨膨脹與貨幣混亂。<sup>80</sup>這種混亂情況的持續惡化，使錢幣

<sup>80</sup> 根據Palgrave's Dictionary 1926年版對該法則的精要解說：「當存在兩種或兩種以上

失信於人，遂導致市場廢行錢幣改用穀帛。正是在這種形勢之下，於是而有兩個悖論的出現。

在兩個悖論的貨幣格局之下，在位者的失政和統治階層的貪饕，將給社會經濟帶來無數的動盪和弊端。僅舉一例，劉宋孝武帝劉駿(453-464 在位)一朝孝建四銖(454)可以作為六朝減重錢的代表，亦是劉宋衰弱的起點，但那時是劉駿「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欒綺節，珠窗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而來。<sup>81</sup>依《宋書》，卷 75，〈顏竣傳〉，其時「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sup>82</sup>《宋書》，卷 45，〈劉懷慎傳〉則載劉亮，「世祖(孝武帝)大明中，為武康令。時境內多盜鑄錢，亮掩討無不禽，所殺以千數」。<sup>83</sup>可見因盜鑄而引發的社會動亂已對國家政權造成威脅。

劉駿因「深賦厚斂，天下騷動」，史臣批評他說：「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觀大明之世，其將盡民命乎！」<sup>84</sup>但一方面民命將盡，一方面「時

---

具有不同內在價值(intrinsic value)的交易媒介，政府卻用法令規定它們的名目價值(nominal value)為相同時，市場將盡可能使用生產成本最低的交易媒介來支付，而較高價值者將在流通領域消失」。換言之，在政府持續鑄造貶值通貨，但又規定它們的名目價值不變之時，劣幣將會驅逐掉良幣。這個過程將不斷惡化，通貨膨脹情勢也會隨之日趨猖獗，除非政府改鑄良幣，或者將它們的名目價值還原，使其與真實價值一致。事實上格氏法則有「正向」和「負向」之別，上面的定義與說明，嚴格地說其實是負向的格氏法則。而如果制度設計正確，「良幣驅逐劣幣」的機制是可以被啟動的，正向的格氏法則就會發揮作用。在接下來中古六朝貨幣史的探究中，我們將看到「劣幣驅逐良幣」的負向的格氏法則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探尋格氏法則的動向，以及它所反映的政策因素和制度基礎，也是中古貨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參閱 John F. Chown, *A History of Money, From AD 800*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7. 更透徹的解釋則可參考 Robert Mundell, "Uses and Abuses of Gresham's Law in the History of Money," *Zagreb Journal of Economics*, 2:2 (1998), 3-38. 關於格氏法則在中國歷史研究上的應用，可參閱陳彥良，〈江陵鳳凰山稱錢衡與格雷欣法則——論何以漢文帝放任私人鑄幣竟能成功〉，《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20卷2期(臺北，2008.06)，頁205-241。

<sup>81</sup> 沈約，《宋書》，卷92，〈良吏傳〉，頁2262。

<sup>82</sup> 沈約，《宋書》，卷75，〈顏竣傳〉，頁1961。

<sup>83</sup> 沈約，《宋書》，卷45，〈劉懷慎傳〉，頁1377。

<sup>84</sup> 李延壽也有同樣的評論：「夫盡人命以自養，蓋惟桀、紂之行；觀夫大明之世，其將盡人命乎！」見沈約，《宋書》，卷6，〈孝武帝本紀〉，頁135；李延壽，《南

在朝勳要，多事產業」，<sup>85</sup>可見貨幣的動盪，誘發六朝權貴官僚豪富投入價格炒作的行列，這無疑將擴大加深當時的社會經濟危機。<sup>86</sup>

值得一提的是，陳寅恪先生據史言「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此人競商販，不為田業」而論說：「南朝的商稅如值百抽四，並不為重。……南朝商業的發達，表明在經濟生活上，南比北要進步。」<sup>87</sup>這樣的見解自然極為正確。不過在此要澄清，南朝經濟生活較北朝進步，揆其原因，除了氣候較溫和、天然資源較多、水運較便利，再就是貨幣使用仍較北朝為多，以及商業稅一般輕於農業稅，均不可忽視。此外，擁官職身份者享多重優待，亦大有關係。如《南史》，卷77，〈恩倖·沈客卿傳〉：「以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關市之稅」。<sup>88</sup>此外，東晉南朝賦役結構與門閥世族政治有關，故州郡衰削，徵求百端，負擔往往落到地著編戶的農民肩上。這些因素都有以致之。根本而言，南朝的商業呈現的是一種結構扭曲下的變相繁榮，是「高門在經濟上之壟斷」的結果，因此不能給予過高估計。<sup>89</sup>有必要提醒的是，倘若南朝錢幣的發行能夠更上軌道，則它的經濟將遠優於其既有的發展，這也是可以確定的事。

#### 四、結論

在市場變遷的過程中，由於市場為通貨不足所阻滯，經濟歸於蕭條，

---

史》，卷2，〈宋本紀中〉，頁72。

<sup>85</sup> 沈約，《宋書》，卷77，〈柳元景傳〉，頁1990。

<sup>86</sup> 貨幣愈動盪，物價漲落愈厲害，官貴豪富之流愈能夠遂行其巧取豪奪的事業，因其資財足贍，憑藉甚厚，且充份掌握政策變動之訊息之故。在此一情勢下，必然加速農村經濟的崩解。梁武帝普通四年鐵錢發行以後的社會狀態正是著例。關於梁代通貨變動與社會危機的關連性問題，作者另有比較深入的勾勒和闡釋。參閱陳彥良，〈梁、陳幣制變動和通縮通脹——鐵錢與「短陌」的形成新探〉（未刊稿）。

<sup>87</sup>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26，〈食貨志〉，頁689；陳寅恪講述，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雲龍出版社，1995），頁366。

<sup>88</sup> 李延壽，《南史》，卷77，〈恩倖·沈客卿傳〉，頁1940。

<sup>89</sup> 語出王伊同，《五朝門第》（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127-157。另參閱張兆凱，〈試論南朝商業的幾點變化〉，《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廈門，1990），頁16-20+15；韓國磐，《南北朝經濟史略》（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頁147。

同時交易轉用穀帛，形成新一輪的通貨緊縮，同時國家因稅基流失，最後財政壓力如故。而社會經濟的不安，不僅帶來內政上的重重隱憂，也為往後的經濟延長了通縮的情勢，為繼起的王朝奠定了貨幣的基本格局。等到新的政權上臺，面臨的財政壓力又迫使它必須發行虛價大錢或輕劣小錢以為救解，但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很快即造成交易的混亂，依照劣幣驅逐良幣的原理，原所使用但本已稀少的優質舊錢不得不退出流通領域(遭到窖藏或改鑄成小錢)。而由於官僚機構的腐化以及盜鑄的盛行，錢幣輕劣化的趨勢無能戢止，演變的結果是大量輕劣新錢因不堪使用以及市場交易的顛覆停頓而歸於廢棄，於是通貨崩潰的情勢又為下一次的貨幣改鑄埋下伏筆。

如前述，中古時期中國主要由於政策的失敗，通貨緊縮、財政壓力、灌水發行、貨幣混亂(膨脹性擾動)、稅基流失這些變數形成一個多迴圈的連鎖循環，或者彼此形成一種複雜難解的因果鏈結，同時這種結構為當時社會經濟帶來通脹與通縮「交替出現」且「同時發生」的雙重流動性衝擊。事實上，中古各朝財政壓力之原因，有帝王奢侈、戰費支出的因素，同時也有社會上豪強蔭冒逃戶、寺院隱庇土田的因素；前者是財政支出浩繁的元凶，後者則導致財政收入的減少。除了這些因素之外，由於貨幣政策竄敗而導致的經濟凋弊、百姓廢業、貧富差距擴大造成稅基流失這一點，同樣是不可忽視的。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預期，如果國家沒有從貨幣與財稅兩方面採取有效且規模足夠大的改革，這個循環鎖鏈是不可能破除的。<sup>90</sup>

從中古自然經濟實質內容的理解，可以糾正某些經濟史觀點的錯誤認知。誠如 18 世紀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所論：

一定比例量的貨幣是一個國家自由而普遍地進行貿易所必需的。多於這個數量，對貿易沒有益處；而少於這個數量，如果非常少，則

<sup>90</sup> 但中古時期之帝王能夠認識貨幣原理，且予以切實遵循者，幾乎可以說沒有。顯著如梁武帝，在推動鐵錢、釀成極大失敗之後，面對顧琛(約482-550)的批評，不但完全否認自己的失策，還能毫無愧色地辯解：「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由這句話可以證明，梁武對於貨幣的運作近於盲瞽，且性格執拗，以故在造成嚴重的貨幣擾亂，瓦解了蕭梁一朝的社會經濟秩序之後，仍無慚悔之意。見姚思廉，《梁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38，〈賀琛傳〉，頁547。



對貿易極其不利。<sup>91</sup>

富蘭克林此言雖然素樸無華，但其內含的貨幣主張卻是顛撲不破的。清初唐甄(1630-1704)敏銳地觀察到康熙(1662-1722)年間經濟凋弊的實景和因由，可為跨時代的佐證。唐氏《潛書》，〈存言〉云：

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日不覩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算；行於都市，列肆焜耀，冠服華臚。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烟，寒則蜎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者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者為妾，惡者為婢，遍海內矣。困窮如是，雖年穀屢豐，而無生之樂。由是風俗日偷，禮義滅絕。<sup>92</sup>

「金錢，所以通有無」，但康熙年間因錢、銀稀少，「無以通之」、「良賈無算」(按：算，數也；「無算」謂無錢可計數)，「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依據唐甄之言，則清初這種「窮困如是」、「無生之樂」的景象，乃通貨不足、錢銀數量緊縮所導致。而經濟的凋弊，不僅使農、工、市、仕皆空，且造成「風俗日偷，禮義滅絕」的社會後果。試比較唐甄所描述清興五十多年的社會經濟狀態，與南朝齊蕭子良所指陳「堙焚剪毀，日月銷滅，貨薄民貧，公私俱困」的情況，豈有二致？而根據前文的梳理可以斷言，中古時期因貨幣制度窳敗而造成的流動性困境以及對社會經濟造成的阻滯作用，實遠超過清初所面臨者。

總之，縱觀中國長遠的歷史，如果說有一個經歷數百年之久、百姓陷入痛苦深淵而發展接近於停滯的「黑暗時代」，那麼無疑以魏晉南北朝這一個階段歷史最足以作為代表。<sup>93</sup>從某些角度看，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濟一樣有

<sup>91</sup> 富蘭克林著，劉學黎譯，〈試論紙幣的性質和必要性〉，《富蘭克林經濟論文選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1。洛克也曾提出類似的見解，見洛克著，徐式谷譯，《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後果》，頁19-21。

<sup>92</sup> 唐甄在〈更幣〉篇亦表示：「穀賤不得飯，肉賤不得食，布帛賤不得衣；……銀少故也」，又道：「當今之人，非窮於財，窮於銀也」，這些評述無非都說明康熙年間導致普遍地物價下跌與經濟蕭條的通貨緊縮的嚴重性。見唐甄，《潛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頁114、140。

<sup>93</sup> 長期的戰亂以及各個王朝的秕政影響中古時期之歷史甚巨。如南朝宋周朗(425-460)

所發展，並非完全頓滯不前。但中古階段與其前面的秦漢，以及後面的隋唐宋比較，其發展要相對緩慢的多，卻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固然戰火的肆虐、民族的衝突、政治的動盪、社會的重組、思想的變異與文化的涵融相互交織，構成了這段無數朝代興亡歷史的大部分內容。但是，由於通貨膨脹、通貨緊縮交替而至且同時發生，這樣一種現象主導的貨幣格局摧折或至少抑制了社會經濟的進步發展，卻也是無庸置疑的。這一消極力量使得「黑暗時代」的時間拖延得更久，直接或間接造成這段期間之內文明發展的扭曲、政治的紛亂不安，以及千千萬萬百姓長期而深重的苦難，這些同樣是傳統歷史的認識上不可忽略的重要史實。

---

於孝建(453-456)年間所述：永嘉之禍以來，「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埋，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南齊武帝蕭蹟(482-493在位)亦道：「自水德將謝，喪亂彌多，師旅歲興，饑饉代有。貧室盡於課調，泉貝傾於絕域，軍國器用，動資四表，不因厥產，咸用九賦，雖有交貿之名，而無潤私之實，民咨塗炭，寔此之由。」其他時期不論，有學者據《晉書》〈石勒載記〉和〈石季龍載記〉粗估，單就後趙30年間，死亡士兵即在100萬人以上。如果說中國歷史有一段「黑暗時代」的話，那麼無可否認魏晉南北朝最足以當之。尤其周朗的一段話，可以作為魏晉南北朝戰禍兵燹的破壞，以及連帶而來的「急政嚴刑」的社會影響，且導致黑暗時代的形成的最好描述。另外，嚴耕望先生從地方政治之積弊，論南北朝國庫之空虛與人民之困窮，亦可以從側面佐證中古時期的「黑暗」。參見沈約，《宋書》，卷82，〈周朗傳〉，頁2094；蕭子顯，《南齊書》，卷3，〈武帝紀〉，頁54；薛平控，〈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貨幣發行與流通〉，《史學月刊》，1994年第1期(鄭州，1994)，頁16-21；嚴耕望，〈從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積弊論隋之致富〉，《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頁397-420。

##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 (一)傳統文獻

- 沈約，〈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  
Shen, Yue. *Song shu*, Taipei: Ding wen shu ju, 1975.
- 蕭子顯，〈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  
Xiao, Zixian. *Nan qi shu*, Taipei: Ding wen shu ju, 1975.
- 魏收，〈魏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Wei, Shou. *Wei shu*, Taipei: Ding wen shu ju, 1979.
- 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  
Du, You. *Tong dia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8.
- 房玄齡等撰，〈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95。  
Fang, Xuanling, deng zhuan. *Jin shu*, Taipei: Ding wen shu ju, 1995.
- 姚思廉，〈梁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  
Yao, Silian. *Liang shu*, Taipei: Ding wen shu ju, 1975.
- 李延壽，〈南史〉，臺北：鼎文書局，1981。  
Li, Yanshou. *Nan shu*, Taipei: Ding wen shu ju, 1981.
- 魏徵，〈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Wei, Zheng. *Sui shu*, Taipei: Ding wen shu ju, 1979.
- 李百藥，〈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  
Li, Baiyao. *Bei qi shu*, Taipei: Ding wen shu ju, 1975.
- 歐陽修，〈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  
Ouyang, Xiu. *Xin tang shu*, Taipei: Ding wen shu ju, 1979.
- 唐甄，〈潛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Tang, Zhen. *Qian shu*, Taipei: He luo tu shu chu ban she, 1974.
- 翁樹培，〈古泉彙考〉，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  
Weng, Shupe. *Gu quan hui kao*, Beijing: Shu mu wen xian chu ban she, 1994.

## (二) 近人論著

王仲殊，〈漢代考古學概說〉，北京：中華書局，1984。

Wang, Zhongshu. *Han dai kao gu xue gai shuo*,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84.

王伊同，〈五朝門第〉，北京：中華書局，2006。

Wang, Yitong. *Wu chao men di*,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06.

王怡辰，〈魏晉南北朝貨幣交易和發行〉，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

Wang, Yichen. *Wei jin nan bei chao huo bi jiao yi he fa xing*, Taipei: Wen jin chu ban she, 2007.

王健，〈試論六朝幣政與商品貨幣經濟的互動關係〉，收入中國錢幣學會古代錢幣委員會、江蘇省錢幣學會編著，〈六朝貨幣與鑄錢工藝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Wang, Jian. "Shi lun liu chao bi zheng yu shang pin huo bi jing ji de hu dong guan xi," shou ru Zhong guo qian bi xue hui gu dai qian bi wei yuan hui, Jiangsu sheng qian bi xue hui, bian zhu, *Liu chao huo bi yu zhu qian gong yi yan jiu*, Nanjing: Feng huang chu ban she, 2005.

王貴忱、劉至臚，〈三國孫吳鑄錢問題探討〉，〈中國錢幣〉，1983年第3期(北京，1983)，頁21-24。

Wang, Guichen, Liu Zhibiao. "San guo sun wu zhu qian wen ti tan tao," *Zhong guo qian bi*, 1983 nian di 3 qi (Beijing, 1983), 21-24.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賴有德執筆)，〈成都東北郊西漢墓葬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8年第2期(北京，1958)，頁14-29。

Sichuan sheng wen wu guan li wei yuan hui (Lai Youde, zhi bi). "Chengdu dong bei jiao xi han mu zang fa jue jian bao," *Kao gu tong xun*, 1958 nian di 2 qi (Beijing, 1958), 14-29.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雷台漢墓〉，〈考古學報〉，1974年第2期(北京，1974)，頁104-105。

Gansu sheng bo wu guan. "Wuwei Leitai han mu," *Kao gu xue bao*, 1974 nian di 2 qi (Beijing, 1974), 104-105.

全漢昇，〈中古自然經濟〉，原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重慶，1948)，頁73-173；全漢昇，〈中國經濟史研究〉上冊，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

Quan, Hansheng. "Zhong gu zi ran jing ji," yuan kan yu, *Zhong yang yan jiu yuan li shi yu yan yan jiu suo ji kan*, di 10 ben (Chungqing, 1948), 73-173; Quan Hansheng. *Zhong guo jing ji shi yan jiu*, shang ce, Taipei: Dao xiang chu ban she,

1991.

朱江，〈無錫壁山莊六朝墓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5年第2期(北京，1955)，頁40-42。

Zhu, Jiang. "Wuxi Bishanzhuang liu chao mu fa jue jian bao," *Kao gu tong xun*, 1955 nian di 2 qi (Beijing, 1955), 40-42.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西的漢墓與六朝墓〉，《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北京，1957)，頁163-168。

Jiangxi sheng wen wu guan li wei yuan hui. "Jiangxi de han mu yu liu chao mu," *Kao gu xue bao*, 1957 nian di 1 qi, (Beijing, 1957), 163-168.

江西省歷史博物館(劉林執筆)，〈江西南昌市東吳高榮墓的發掘〉，《考古》，1980年第3期(北京，1980)，頁219-228。

Jiangxi sheng li shi bo wu guan (Liu Lin, zhi bi). "Jiangxi Nanchang shi dong wu Gaorong mu de fa jue," *Kao gu*, 1980 nian di 3 qi (Beijing, 1980), 219-228.

何茲全，〈東晉南朝的錢幣使用與錢幣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4本(上海，1949)，頁21-56。

He, Ziquan. "Dong jin nan chao de qian bi shi yong yu qian bi wen ti," *Li shi yu yan yan jiu suo ji kan*, di 14 ben (Shanghai, 1949), 21-56.

余林森、徐勁松、余夏紅、謝四海，〈湖北鄂州新見太平百金及相關問題探討〉，《中國錢幣》，2008年第2期(北京，2008)，頁17-22。

Yu, Linsen, Xu Jinsong, Yu Xiahong, Xie Sihai. "Hubei Ezhou xin jian tai ping bai jin ji xiang guan wen ti tan tao," *Zhong guo qian bi*, 2008 nian di 2 qi (Beijing, 2008), 17-22.

吳榮曾，〈鵝眼錢考辨〉，《中國錢幣》，1995年第2期(北京，1995)，頁42-44。

Wu, Rongceng. "E yan qian kao bian," *Zhong guo qian bi*, 1995 nian di 2 qi (Beijing, 1995), 42-44.

呂思勉，《兩晉南北朝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69。

Lu, Simian. *Liang jin nan bei chao shi*, Taipei: Taiwan kai ming shu dian, 1969.

李劍農，《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臺北：華世出版社，1981。

Li, Jiannong. *Wei jin nan bei chao sui tang jing ji shi gao*, Taipei: Hua shi chu ban she, 1981.

李蔚然，〈南京南郊鄧府山發現六朝古墓〉，《考古通訊》，1955年第2期(北京，1955)，頁52。

Li, Weiran. "Nanjing nan jiao Dengfushan fa xian liu chao gu mu," *Kao gu tong xun*, 1955 nian di 2 qi (Beijing, 1955), 52.

沈仲常、王家祐，〈記四川巴縣冬筭壩出土的古印及古貨幣〉，《考古通訊》，1955

年第6期(北京, 1955), 頁48-54。

Shen, Zhongchang, Wang Jiayou. "Ji Sichuan Ba xian Dongsunba chu tu de gu yin ji gu huo bi," *Kao gu tong xun*, 1955 nian di 6 qi (Beijing, 1955), 48-54.

周衛榮, 《中國古代錢幣合金成分研究》, 北京: 中華書局, 2004。

Zhou, Weirong. *Zhong guo gu dai qian bi he jin cheng fen yan jiu*.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2004.

林鐘雄, 《貨幣銀行學》, 臺北: 三民書局, 1990。

Lin, Zhongxiong. *Huo bi yin hang xue*, Taipei: San min shu ju, 1990.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第二隊(蔣若是、郭文軒執筆), 〈洛陽晉墓的發掘〉, 《考古學報》, 1957年第1期(北京, 1957), 頁169-185。

Henan sheng wen hua ju wen wu gong zuo dui di er dui (Jiang Ruoshi, Guo Wenxuan, zhi bi). "Luoyang jin mu de fa jue," *Kao gu xue bao*, 1957 nian di 1 qi (Beijing, 1957), 169-185.

南京市博物館(李翔執筆), 〈南京市江寧區胡村南朝墓〉, 《考古》, 2008年第6期(北京, 2008), 頁51-57。

Nanjing shi bo wu guan (Li Xiang, zhi bi). "Nanjing shi Jiangning qu Hu cun nan chao mu," *Kao gu*, 2008 nian di 6 qi (Beijing, 2008), 51-57.

南京市博物館(祁海寧、張金喜執筆), 〈南京市棲霞區東楊坊南朝墓〉, 《考古》, 2008年第6期(北京, 2008), 頁36-42。

Nanjing shi bo wu guan (Qi Haining, Zhang Jinxi, zhi bi). "Nanjing shi Qixia qu Dongyangfang nan chao mu," *Kao gu*, 2008 nian di 6 qi (Beijing, 2008), 36-42.

南京市博物館、江寧區博物館, 〈南京隱龍山南朝墓〉, 《文物》, 2002年第7期(北京, 2002), 頁57。

Nanjing shi bo wu guan, Jiangning qu bo wu guan. "Nanjing Yinlongshan nan chao mu," *Wen wu*, 2002 nian di 7 qi (Beijing, 2002), 57.

南京市博物館、江寧縣博物館(祁海寧執筆), 〈南京市東善橋「鳳凰三年」東吳墓〉, 《文物》, 1999年第4期(北京, 1999), 頁32-37。

Nanjing shi bo wu guan, Jiangning xian bo wu guan (Qi Haining, zhi bi). "Nanjing shi Dongshanqiao 'feng huang san nian' dong wu mu," *Wen wu*, 1999 nian di 4 qi (Beijing, 1999), 32-37.

南京市博物館、雨花台區文化廣播電視局(祁海寧、陳大海執筆), 〈南京市雨花台區南朝畫像磚墓〉, 《考古》, 2008年第6期(北京, 2008), 頁43-50。

Nanjing shi bo wu guan, Yuhuatai qu wen hua guang bo dian shi ju (Qi Haining, Chen Dahai, zhi bi). "Nanjing shi Yuhuatai qu nan chao hua xiang zhuan mu," *Kao gu*, 2008 nian di 6 qi (Beijing, 2008), 43-50.

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江寧區博物館，〈南京江寧上湖孫吳、西晉墓〉，《文物》，2007年第1期(北京，2007)，頁35-49。

Nanjing shi bo wu guan, Nanjing shi Jiangning qu bo wu guan. "Nanjing Jiangning Shanghu sun wu, xi jin mu," *Wen wu*, 2007 nian di 1 qi (Beijing, 2007), 35-49.

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棲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年第5期(北京，1976)，頁316-325。

Nanjing bo wu yuan, Nanjing shi wen wu bao guan wei yuan hui. "Nanjing Qixiashan Ganjiexiang liu chao mu qun," *Kao gu*, 1976 nian di 5 qi (Beijing, 1976), 316-325.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司馬國紅等執筆)，〈河南洛陽市龍門鎮唐墓發掘簡報〉，《考古》，2007年第12期(北京，2007)，頁50-55。

Luoyang shi wen wu gong zuo dui (Sima Guohong, deng zhi bi). "Henan Luoyang shi Longmen zhen tang mu fa jue jian bao," *Kao gu*, 2007 nian di 12 qi (Beijing, 2007), 50-55.

胥浦六朝墓發掘隊(吳煒等執筆)，〈揚州胥浦六朝墓〉，《考古學報》，1988年第2期(北京，1988)，頁233-255。

Xupu liu chao mu fa jue dui (Wu Wei, deng zhi bi). "Yangzhou Xupu liu chao mu," *Kao gu xue bao*, 1988 nian di 2 qi (Beijing, 1988), 233-255.

范衛紅，〈南朝鑄錢工藝、鑄錢機構及鑄錢特點芻論〉，收入中國錢幣學會古代錢幣委員會、江蘇省錢幣學會編著，《六朝貨幣與鑄錢工藝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Fan, Weihong. "Nan chao zhu qian gong yi, zhu qian ji gou ji zhu qian te dian chu lun," *shou ru Zhong guo qian bi xue hui gu dai qian bi wei yuan hui, Jiangsu sheng qian bi xue hui, bian zhu, Liu chao huo bi yu zhu qian gong yi yan jiu*, Nanjing: Feng huang chu ban she, 2005.

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Tang, Changru. *Wei jin nan bei chao sui tang shi san lun*, Wuhan: Wu han da xue chu ban she, 199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繼根執筆)，〈杭州地區漢、六朝墓發掘簡報〉，《東南文化》，1989年第2期(南京，1989)，頁111-128。

Zhejiang sheng wen wu kao gu yan jiu suo (Hu Jigen, zhi bi). "Hangzhou di qu han, liu chao mu fa jue jian bao," *Dong nan wen hua*, 1989 nian di 2 qi (Nanjing, 1989), 111-128.

馬乘風，〈從西周到隋初之一千七百餘年的經濟轉移〉，收入于宗先等編，《中國經濟發展史論文選集》下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

- Ma, Chengfeng. "Cong xi zhou dao sui chu zhi yi qian qi bai yu nian de jing ji zhuan yi," shou ru Yu Zongxian, deng bian, *Zhong guo jing ji fa zhan shi lun wen xuan ji*, xia ce,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shi ye gong si, 1980.
- 馬得志, 〈安陽大司空村的一個唐墓〉, 《考古通訊》, 1955年第4期(北京, 1955), 頁54-56。
- Ma, Dezhi. "Anyang Dasikong cun de yi ge tang mu," *Kao gu tong xun*, 1955 nian di 4 qi (Beijing, 1955), 54-56.
- 高明士, 〈唐宋間歷史變革之時代性質的論戰〉, 《戰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 臺北: 東昇出版社, 1982。
- Gao, Mingshi. "Tang song jian li shi bian ge zhi shi dai xing zhi de lun zhan," *Zhan hou ri ben de zhong guo shi yan jiu*, Taipei: Dong sheng chu ban she, 1982.
- 張兆凱, 〈試論南朝商業的幾點變化〉,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1990年第2期(廈門, 1990), 頁16-20+15。
- Zhang, Zhaokai. "Shi lun nan chao shang ye de ji dian bian hua," *Zhong guo she hui jing ji shi yan jiu*, 1990 nian di 2 qi (Xiamen, 1990), 16-20+15.
- 陳彥良, 〈東漢長期通貨膨脹——兼論「中古自然經濟」的形成〉, 《清華學報》, 新41卷4期(新竹, 2011.12), 頁669-714。
- Chen, Yenliang, "Dong han chang qi tong huo peng zhang: jian lun 'zhong gu zi ran jing ji' de xing cheng," *Qing hua xue bao*, xin 41 juan 4 qi (Hsinchu, 2011.12), 669-714.
- 陳彥良, 〈江陵鳳凰山稱錢衡與格雷欣法則——論何以漢文帝放任私人鑄幣竟能成功〉,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第20卷第2期(臺北, 2008.06), 頁205-241。
- Chen, Yenliang. "Jiangling Fenghuangshan cheng qian heng yu ge lei xin fa ze: lun he yi han wen di fang ren si ren zhu bi jing neng chen gong," *Ren wen ji she hui ke xue ji kan*, di 20 juan di 2 qi (Taipei: 2008.06), 205-241.
- 陳彥良, 〈梁、陳幣制變動和通縮通脹——鐵錢與「短陌」的形成新探〉(未刊稿)。
- Chen, Yenliang. "Liang, chen bi zhi bian dong he tong suo tong zhang: tie qian yu 'duan mo' de xing cheng xin tan," (wei kan gao).
- 陳啟天, 《寄園回憶錄》,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5。
- Chen, Qitian. *Ji yuan hui yi lu*, Taipei: Taiwan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65.
- 陳寅恪, 〈論韓愈〉, 《金明館叢稿初編》, 臺北: 里仁書局, 1981。
- Chen, Yinke. "Lun han yu," *Jin ming guan cong gao chu bian*, Taipei: Li ren shu ju, 1981.
- 陳寅恪講述, 萬繩楠整理, 《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臺北: 雲龍出版社, 1995。



- Chen, Yinke, jiang shu, Wan Shengnan, zheng li. *Chen yin ke wei jin nan bei chao shi jiang yan lu*, Taipei: Yun long chu ban she, 1995.
- 陳福坤，〈南京太平門外新庄村宋墓清理記略〉，《考古通訊》，1958年第12期(北京，1958)，頁35-38。
- Chen, Fukun. “Nanjing Taipingmen wai Xinzhuang cun song mu qing li ji lue,” *Kao gu tong xun*, 1958 nian di 12 qi (Beijing, 1958), 35-38.
- 陶希聖、武仙卿，《南北朝經濟史》，臺北：食貨出版社，1979。
- Tao, Xisheng, Wu Xianqing. *Nan bei chao jing ji shi*, Taipei: Shi huo chu ban she, 1979.
- 傅築夫，〈貨幣經濟的衰落與實物貨幣的代興〉，《中國經濟史論叢》，臺北：谷風出版社，1987。
- Fu, Zhufu. “Huo bi jing ji de shuai luo yu shi wu huo bi de dai xing,” *Zhong guo jing ji shi lun cong*, Taipei: Gu feng chu ban she, 1987.
- 勞榦，《魏晉南北朝史》，臺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80。
- Lao, Gan. *Wei jin nan bei chao shi*, Taipei: Zhong guo wen hua xue yuan chu ban bu, 1980.
-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Peng, Xinwei. *Zhong guo huo bi shi*, Shanghai: Shanghai ren min chu ban she, 2007.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學、鄂州市博物館，《鄂城六朝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 Hubei sheng wen wu kao gu yan jiu suo, Nanjing da xue, Ezhou shi bo wu guan. *E cheng liu chao mu*, Beijing: Ke xue chu ban she, 2003.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館(李桃園、吳勁松執筆)，〈湖北鄂州市塘角頭六朝墓〉，《考古》，1996年第11期(北京，1996)，頁961-987。
- Hubei sheng wen wu kao gu yan jiu suo, Ezhou shi bo wu guan (Li Taoyuan, Wu Jinsong, zhi bi). “Hubei Ezhou shi Tangjiaotou liu chao mu,” *Kao gu*, 1996 nian di 11 qi (Beijing, 1996), 961-987.
- 無為縣文物管理所何福安，〈安徽無為縣發現一座宋代磚室墓〉，《考古》，2005年第3期(北京，2005)，頁95-96。
- Wuwei xian wen wu guan li suo He Fuan. “Anhui Wuwei xian fa xian yi zuo song dai zhuan shi mu,” *Kao gu*, 2005 nian di 3 qi (Beijing, 2005), 95-96.
- 舒城縣文物管理所(奚明執筆)，〈安徽舒城縣三里村宋墓的清理〉，《考古》，2005年第1期(北京，2005)，頁45-51。
- Shucheng xian wen wu guan li suo (Xi Ming, zhi bi). “Anhui Shucheng xian Sanli

- cun song mu de qing li,” *Kao gu*, 2005 nian di 1 qi (Beijing, 2005), 45-51.
- 鄂州市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鄂州鄂鋼飲料廠一號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98年第1期(北京，1998)，頁103-127。
- Ezhou shi bo wu guan, Hubei sheng wen wu kao gu yan jiu suo. “Hubei Ezhou e gang yin liao chang yi hao mu fa jue bao gao,” *Kao gu xue bao*, 1998 nian di 1 qi (Beijing, 1998), 103-127.
- 馮務建，〈鄂州六朝墓出土錢幣芻議〉，收入中國錢幣學會古代錢幣委員會、江蘇省錢幣學會編著，*《六朝貨幣與鑄錢工藝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 Feng, Wujian. “Ezhou liu chao mu chu tu qian bi chu yi,” shou ru Zhong guo qian bi xue hui gu dai qian bi wei yuan hui, Jiangsu sheng qian bi xue hui, bian zhu, Liu chao huo bi yu zhu qian gong yi yan jiu, Nanjing: Feng huang chu ban she, 2005.
- 黃義軍、徐勁松、何建萍，〈湖北鄂州郭家細灣六朝墓〉，*《文物》*，2005年第10期(北京，2005)，頁34-45。
- Huang, Yijun, Xu Jinsong, He Jianping. “Hubei Ezhou Guojiaxiwan liu chao mu,” *Wen wu*, 2005 nian di 10 qi (Beijing, 2005), 34-45.
- 嵯縣文管會(張恒執筆)，〈浙江嵯縣六朝墓〉，*《考古》*，1988年第9期(北京，1988)，頁800-813。
- Shengxian wen guan hui (Zhang Heng, zhi bi). “Zhejiang Shengxian liu chao mu,” *Kao gu*, 1988 nian di 9 qi (Beijing, 1988), 800-813.
- 鄒志諒，〈中國錢幣鑄造工藝史上燦爛的一頁——六朝疊鑄式陶質錢範的演進與成效〉，*《中國錢幣》*，2003年第1期(北京，2003)，頁8-13。
- Zou, Zhiliang. “Zhong guo qian bi zhu zao gong yi shi shang can lan de yi ye: liu chao die zhu shi tao zhi qian fan de yan jin yu cheng xiao,” *Zhong guo qian bi*, 2003 nian di 1 qi (Beijing, 2003), 8-13.
- 鄒志諒，〈鎮江南朝蕭梁五銖錢範考察〉，*《中國錢幣》*，1999年第1期(北京，1999)，頁40。
- Zou, Zhiliang. “Zhenjiang nan chao xiao liang wu zhu qian fan kao cha,” *Zhong guo qian bi*, 1999 nian di 1 qi (Beijing: 1999), 40.
- 熊壽昌，〈從鄂鋼飲料廠一號墓出土錢幣看六朝墓葬隨葬錢幣的有關問題〉，收入中國錢幣學會古代錢幣委員會、江蘇省錢幣學會編著，*《六朝貨幣與鑄錢工藝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 Xiong, Shouchang. “Cong e gang yin liao chang yi hao mu chu tu qian bi kan liu chao mu zang sui zang qian bi de you guan wen ti,” shou ru Zhong guo qian bi xue hui gu dai qian bi wei yuan hui, Jiangsu sheng qian bi xue hui, bian zhu, Liu chao huo bi yu zhu qian gong yi yan jiu, Nanjing: Feng huang chu ban she, 2005.

-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林宗鴻執筆)，〈福建漳浦縣劉坂鄉唐墓清理簡報〉，《考古》，1959年第11期(北京，1959)，頁608-610。
- Fujian sheng wen wu guan li wei yuan hui (Lin Zonghong, zhi bi). "Fujian Zhangpu xian Liuban xiang tang mu qing li jian bao," *Kao gu*, 1959 nian di 11 qi (Beijing, 1959), 608-610.
- 劉建國，〈論梁五銖與公式女錢——從鎮江蕭梁鑄錢遺址的發現談起〉，《中國錢幣》，1999年第2期(北京，1999)，頁16-21。
- Liu, Jianguo. "Lun liang wu zhu yu gong shi nu qian: cong Zhenjiang xiao liang zhu qian yi zhi de fa xian tan qi," *Zhong guo qian bi*, 1999 nian di 2 qi (Beijing, 1999), 16-21.
- 劉建國、高嵐，〈試論六朝錢帛貨幣的歷史地位〉，《江漢考古》，1989年第2期(武漢，1989)，頁95-103。
- Liu, Jianguo, Gao Lan. "Shi lun liu chao qian bo huo bi de li shi di wei," *Jiang han kao gu*, 1989 nian di 2 qi (Wuhan, 1989), 95-103.
- 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麥英豪執筆)，〈廣州六朝磚室墓清簡報〉，《考古通訊》，1956年第3期(北京，1956)，頁29-34。
- Guangzhou shi wen wu guan li wei yuan hui (Mai Yinghao, zhi bi). "Guangzhou liu chao zhuan shi mu qing jian bao," *Kao gu tong xun*, 1956 nian di 3 qi (Beijing, 1956), 29-34.
- 錢公博，《中國經濟發展史》，臺北：文景出版社，1982。
- Qian, Gongbo. *Zhong guo jing ji fa zhan shi*, Taipei: Wen jing chu ban she, 1982.
- 薛平拴，〈論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貨幣發行與流通〉，《史學月刊》，1994年第1期(鄭州，1994)，頁16-21。
- Xue, Pingshuan. "Lun wei jin nan bei chao shi qi de huo bi fa xing yu liu tong," *Shi xue yue kan*, 1994 nian di 1 qi (Zhengzhou, 1994), 16-21.
- 謝世平，〈安陽出土南北朝古錢窖藏〉，《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鄭州，1986)，頁36-41。
- Xie, Shiping. "Anyang chu tu nan bei chao gu qian jiao cang," *Zhong yuan wen wu*, 1986 nian di 3 qi (Zhengzhou, 1986), 36-41.
- 韓國磐，《南北朝經濟史略》，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0。
- Han, Guopan. *Nan bei chao jing ji shi lue*, Xiamen: Xiamen da xue chu ban she, 1990.
- 羅宗真，《魏晉南北朝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Luo, Zongzhen. *Wei jin nan bei chao kao gu*, Beijing: Wen wu chu ban she, 2001.
- 麗水市博物館(吳東海執筆)，〈浙江麗水市發現一座南宋墓〉，《考古》，2004年

第10期(北京, 2004), 頁93-96。

Lishui shi bo wu guan (Wu Donghai, zhi bi) “Zhejiang Lishui shi fa xian yi zuo nan song mu,” *Kao gu*, 2004 nian di 10 qi (Beijing, 2004), 93-96.

嚴耕望, 〈從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積弊論隋之致富〉, 《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 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1。

Yan, Gengwang. “Cong nan bei chao di fang zheng zhi zhi ji bi lun sui zhi zhi fu,” *Yan Gengwang shi xue lun wen xuan ji*, Taipei: Lian jing chu ban shi ye gong si, 1991.

### (三) 外文文獻

川勝義雄著, 夏日新譯, 〈侯景之亂與南朝的貨幣經濟〉, 收入劉俊文主編, 《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集》第4卷, 北京: 中華書局, 1993。

Chuansheng, Yixiong, chu, Xia Rixin, yi. “Houjing zhi luan yu nan chao de huo bi jing ji,” shou ru Liu Junwen, zhu bian, *Ri ben xue zhe yan jiu zhong guo shi lun zhu xuan ji*, di 4 juan, Beijing, Zhong hua shu ju, 1993.

岡崎文夫, 《南北朝に於ける社會經濟制度》, 東京: 弘文堂, 1967。

Okazaki, Fumio. Nanbokuchō ni okeru shakai keizai seido. Tōkyō: Kōbundō, 1967.  
柿沼陽平, 〈唐代貨幣經濟の構造とその特質〉, 《東方學》, 120輯(東京, 2010), 頁18-33。

Kakinuma, Yōhei. Shindai kahei keizai no kōzō to so no tokushitsu, Tōhō gaku, 120 shū (Toyko, 2010), 18-33.

洛克著, 徐式谷譯, 《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後果》,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97。

Luo ke, zhu, Xu Shigu, yi. *Lun jiang di li xi he ti gao huo bi jia zhi de hou guo*, Beijing: Shang wu yin shu guan, 1997.

韋伯著, 康樂編譯, 《經濟與歷史: 韋伯選集(IV)》, 臺北: 遠流出版社, 1990。

Wei bo, zhu, Kang Le, bian yi. *Jing ji yu li shi: wei bo xuan ji (IV)*, Taipei: Yuan liu chu ban she, 1990.

富蘭克林著, 劉學黎譯, 〈試論紙幣的性質和必要性〉, 《富蘭克林經濟論文選集》,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7。

Fu lan ke lin, zhu, Liu Xueli, yi. “Shi lun zhi bi de xing zhi he bi yao xing,” *Fu lan ke lin jing ji lun wen xuan ji*, Beijing: Shang wu yin shu guan, 2007.

Chown, John F. *A History of Money, From AD 800*,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Mayer, Thomas, James S. Duesenberry and Robert Z. Aliber. *Money, Banking, and the*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1984.

Mundell Robert. "Uses and Abuses of Gresham's Law in the History of Money," *Zagreb Journal of Economics*, 2:2(1998), 3-38.

## **Characteristics of Monetary Liquidity in Medieval China**

Chen, Yen-l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Liquidity” refers to the speed and convenience in which a asset can be exchanged to obtain other goods. Compared with other objects, the metal-cast (gold, silver, copper etc.) coins have the best liquidity. Difficulties in bartering are a result of poor liquidity. The quantity of money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liquidity in any economic system. “Liquidity surplus” results in the inflation and “liquidity shortage” in deflation. Any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quantity of money (deflation/inflation) will therefore have a “liquidity impact” on the economy.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concept of liquidity. The “dual liquidity dilemma” in medieval Chinese society will be examined. This refers to the co-existence and the intertwining of deflation and inflation. It is argued that the dilemma w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insufficient currency supplies, low value money repeatedly being minted, frequent policy change, and massive coin cutting. The dilemma was characterized with the pattern of “the alternative inflation disturbance in the long-term deflation.” This dual liquidity dilemma is supported by both textual resources and archeological evidence. This dilemma in medieval China was essentially caused by improper monetary policies in many political regimes. It was one of the major forces in shaping the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of this time period.

**Keywords: Medieval China, monetary history, liquidity, deflation & inflation, natural economy**